

邊方有警： 蒙古掠晉與明代山西的築城高潮^{*}

李嘎^{**}

明代山西築城次數多達646次，存在多次築城高峰期，其中正統末景泰初年、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隆慶元年至四年為三波規模最大的築城高潮。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後的蒙古掠晉、嘉靖十九至二十一年蒙古軍隊深入山西腹裏、隆慶元年蒙古掠晉，是導致三波築城運動的背景因素。三波築城均是通過官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組織實施的，督撫一道一州縣的組織模式甚為常見。因為蒙古軍隊波及範圍的不同，導致每次築城運動在空間布局上也存在差異。築城工程量均頗為可觀，從修築明細可見防範蒙古攻城的戰備色彩十分明顯。從正統末景泰初到嘉靖、隆慶年間關廂城數量由少而多的史實中，能夠折射出山西城市經濟不斷發展的大趨勢。從三波築城高潮中亦可發現山西士紳群體不斷發展壯大的事實，正統末景泰初年的築城運動中並未見士紳的參與，而在後兩次的築城運動中，士紳群體已經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參與進來。

關鍵詞：築城 戰爭 明蒙關係 明代 山西

^{*} 本文最初於2012年11月16-17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得到許多與會學者指正，兩位匿名評審人也對本文的修改提出很多建議。謹此一並致以謝忱。另，本文的創作受到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環境史視野下華北區的洪水災害與城市水環境研究（1368-1949）」（批准號：12CZS073）的經費資助。

^{**}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前言

1368年閏七月，明將徐達（1332-1385）、常遇春（1330-1369）克通州，元順帝（1320-1370）北退塞外，中國版圖上由此出現了南北兩個政權，明蒙關係也因之成為此後相當長時期內東亞地區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長期以來，海內外但凡研究明代蒙古史或明帝國邊防問題的學者，往往無法回避對明蒙關係的關注，由此累積了豐厚的研究成果。¹綜而觀之，學者們對明蒙關係的探討多置於王朝國家的視野下來開展。最近，趙世瑜將明蒙關係置於更為宏觀的全球史框架下加以詮釋，認為蒙古方面對貿易的渴求為整個歐亞大陸中部城鎮、商業發展的組成部分，而明朝方面民間貿易的積極態勢，也與明朝中葉貿易規模的擴大、市場網路的形成有直接的關聯，後者又與國際間的商業發展及貿易需求有關。²趙世瑜的研究無疑提供了進一步理解明蒙關係的新視角。筆者以為，地方尺度的「微觀」視野同樣可以成為推進明蒙關係問題研究的重要路徑，同時認為，這裡的「地方」一定要突破僅僅囿於「邊界地帶」的做法，³而應推及至更廣大的「區域」。基於此，本文以明蒙關係

¹ 學界涉及明蒙關係的研究成果極多，僅擇其要者臚列於次。日本學界：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東京：東洋文庫，1959）。中譯：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0）。松本隆晴，《明代北邊防衛體制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1）。歐美學界：Henry Serruys,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 3 Vols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59-1975). Henry Serruys and Francoise Aubin, *The Mongols and Ming China: Customs and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7). 中國學界：戴鴻義，《明代庚戌之變和隆慶和議》（北京：中華書局，1982）。楊紹猷，《俺答汗評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達力札布，《明代漠南蒙古歷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于默穎，〈明蒙關係研究：以明蒙雙邊政策及明朝對蒙古的防禦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論文，2004）。趙現海，〈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

² 趙世瑜，〈時代交替視野下的明代「北虜」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頁63-74。

³ 實際上，學界對明蒙邊界地帶相關問題的研究，多數仍舊是基於華夷觀念，以國家尺度關懷下所產生的成果。

惡化情形下的「虜患」問題為切入，以「虜患」在明帝國的區域性影響為議題，集中考察「虜患」背景下的築城活動，所選擇的「地方」則是明帝國的邊疆區域——山西省。具體研究路徑為，首先全面復原有明一代山西的築城大勢，借此提煉「虜患」所引致的築城高峰，然後對每次築城高潮的詳細背景、組織情況、波及範圍及工程量等問題加以考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築城運動折射出的社會經濟意義。希望藉此能對明蒙關係問題的研究有所助益，同時能夠推動山西區域史的研究。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築城活動係指地方治所城市的創築、修築行為。

學界對明代築城問題的研究由來久矣，其中，徐泓對明代福建築城運動的考察可謂有鑿空之功。⁴徐泓依靠實錄及方志資料，對有明一代福建築城運動的興起及其背景、築城經費的籌措、民眾對築城運動的反應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認為，福建築城經歷了元末明初、明代中期、明代後期三波高潮期，每一波築城運動的興起或受民變影響、或為防備倭寇，各自有著不同的背景，每一波築城的主要地區也並不相同，如何籌措經費是築城工程能否順利推進的主要支配因素，至明代後半期，隨著鄉紳、富民及商人力量的興起，此一群體成為經費問題能否解決的關鍵。該文雖絲毫未關涉明代山西的築城問題，但卻是啟發筆者創作拙文、乃至確定研究框架的最重要成果。

成一農以歸納出中國不重視築城的時代為問題關懷，對古代地方城市築城史進行了考察。就明代而言，成一農統計了明代各省不同時期的修城次數，認為明前期築城並不十分普遍，屬於自唐代即已開始的不重視城牆修築的時期，但自正統、景泰年間開始，築城活動急劇增多，且一直持續到明末。⁵成一農指出了明初至正統年間並非築城高峰期，以及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對華北地區形成築城高潮有重要影響，這兩個觀點是該文的重要貢獻所在，但卻有失之粗疏的現象，一則在於，明帝國地域廣袤，諸省分均有不同的地緣特徵及社會背景，在自正統末直至明末近二百年的漫長時段中，全國或各省內部是否也存在築城的高低潮？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

⁴ 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1999：1，頁 25-75。

⁵ 成一農，《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217-237。

所在。再者，成一農對明代各省築城次數的統計很可能有偏低之嫌。理由有二，一是其所依據的資料來源僅為〔雍正〕《山西通志》，實際上該資料所記載的築城活動並不全面，且有諸多地方記載模糊，無法確認究竟是一次還是多次築城行為，對此必須通過多種資料相互辨析、補充。理由之二在於成一農可能並未將明代大量存在的關廂城的修築活動列入統計範圍。在筆者看來，北宋以降，城市的關廂地帶有了明顯發展，理當視作城市建成區的一部分，大量方志亦將關廂築城置於「城池志」篇章加以記載，正是明證，因此，關廂城的修築實應作為築城行為加以統計。成一農的大作亦是促使筆者撰寫拙文的重要原因。

一、明代山西的築城大勢

筆者依靠成化、嘉靖、萬曆、康熙、雍正、光緒朝所修六種《山西通志》及百餘種明清山西府州縣志，同時參考《明實錄》，對明代山西的築城次數作了細緻統計。統計時的史料取捨原則是：關於某城某次的修築時間，若相關資料存在記載相左之處，首先以早出的資料為據；如果早出資料記載某次築城行為在某一時期，但後出的多種資料記載為另一時期且時間相吻合，則不從早出史料；若早出資料記載某一時期無築城行為，而後出其他史料均記載曾有築城，且言之鑿鑿，則亦不從早出資料。在這一工作思路下，得出有明一代山西築城次數達646次，大大超過成一農439次的統計結果。⁶若以帝王年號加以歸納，其時間分布如表一所示：

表一 明代山西築城次數的朝代分布一覽表

朝代	洪武	建文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次數	37	0	4	1	2	17	62	7
朝代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天啟	崇禎
次數	16	16	48	153	75	126	7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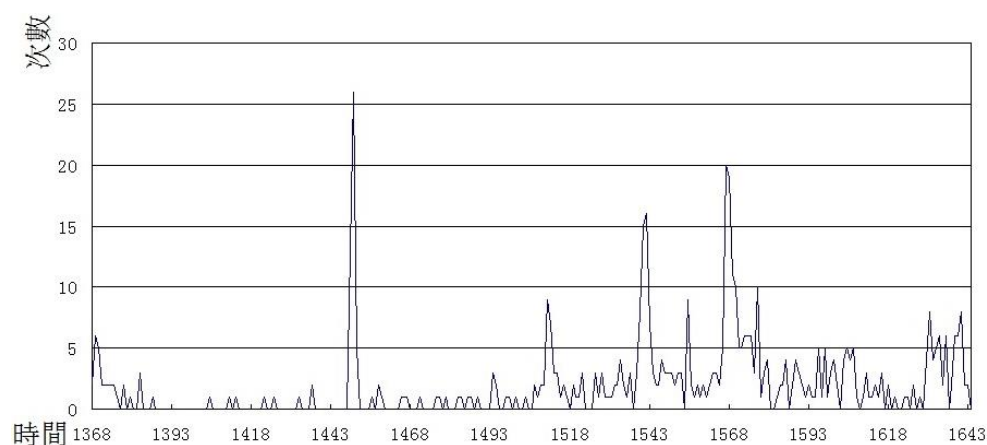
⁶ 成一農，《古代城市形態研究方法新探》，頁218。

資料來源：成化、嘉靖、萬曆、康熙、雍正、光緒《山西通志》、百餘種山西明清修府州縣志、《明實錄》。

說明：因光宗泰昌帝在位僅一個月，且期內並無築城活動，表一從略。

實際上，僅將築城次數滿足於「朝代」精度是遠遠不夠的，仍無法清晰復原出明代山西築城的高峰與低谷。基於此，筆者進一步將築城次數精度提高至「年度」級別。經統計，除109次築城行為因記載為「某某（年號）間」、「某某（年號）初」、「某某（年號）末」，而無法確定具體修築時間之外，凡有537次築城行為可精確至「年度」級別。筆者將其繪製為波狀圖如下：

圖1 明代山西築城次數年際波動圖



統計顯示，明代山西存在多次築城高峰期，其中最明顯者為景泰元年（1450），該年築城次數達26次，實際上正統十四年（1449）和景泰二年的築城次數也頗為可觀，分別為13次和5次。必須指出的是，文獻中記載築城時間為「景泰初」者另有29次，記載為「正統末」者有1次，若將此30次計算在內，則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次數高達74次，實為明代山西的第一個築城高峰。隆慶元年至四年（1567-1570）為第二個高峰期，築城次數分別為20、19、11、10次，另有1次因史料記載為「隆慶初」而無法落實具體年度，但必定不出隆慶元年至四年的範疇，則此一時段的築城次數亦高達61次。第三個高峰期出現在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1540-1543），分別為8、15、16、7次，共46

次。正德六年至七年（1511-1512）可視為第四個高峰期，分別有9次和7次築城行為；嘉靖三十四年（1555）、萬曆五年（1577）、崇禎四年（1631）、崇禎十四年（1641）四個年分的築城次數分別是9、10、8、8次，亦較為可觀。相較之下，洪武年間無論在朝代築城數量和年際築城數量方面均不可觀，並不是明代築城的高峰。總體來看，前三個高峰期的築城次數遠遠超出其他幾次高峰，這是顯而易見的。

一般而言，由於成規模的城池修築，需要消耗大量經費，在無重大人為或自然事件發生的情形之下，地方官府往往不會輕易大築、大修。以此推之，上述數次築城高峰的背後就存在頗可探究的「隱情」，現在追溯起來，民變、地震災害、外敵擾掠是最為主要的三大因素。⁷譬如，正德六年至七年16座城池的修築，就與以楊虎為首的「流寇」轉戰山西有直接關聯。正德六年，楊虎與「流寇」劉六、劉七聯合，率其中一軍轉戰河北、河南、山西，慘烈戰事之後諸多城池均告失守，地方大震，《明實錄》記載說：

賊楊虎等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遼諸州，陵川、壺關、高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祁、太谷諸縣皆殘破，殺掠以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坐逮問者四十二人。⁸

上引文所記述的是「流寇」最終攻破的城池，受到波及的城池實際遠不只此數。史料中有不少因「流寇」而築城的記載，如太谷城，「正德六年，流寇入城，後郡司馬張冕署邑事，增高二丈五尺，門各加以磚甃，建重樓於上」；⁹再如靈石城，「正德辛未（六年），為流寇所破，知縣孫璉、主簿郭清築，加高厚各四之一，建南北城樓，四隅角樓」；¹⁰又如潞州的長子城，「正德七年，

⁷ 需要指出的是，淫雨浸霖、洪水衝擊等也是古代城牆修築的重要動因，但此種類型的築城行為在時間分布上往往是零星的、分散的，並不是誘發築城高潮的主要因素。

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以下所載引明代各朝實錄並同），卷 86，正德七年四月戊寅條，頁 1842-1843。

⁹ [清]高繼允修，[清]姚孔碩、[清]涂逢豫纂，[乾隆]《太谷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 1，〈城池〉，頁 981。

¹⁰ [清]侯榮圭纂，[康熙]《靈石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卷 1，〈地理·城池〉，頁 6a。

知縣史紀值「流寇」之變，因舊加築，增高三丈五尺，隍闊二丈，池深一丈五尺，樓櫓鋪舍一十有九間」。¹¹嘉靖三十四年修築的9座城池有8座位處晉南，即蒲州、曲沃、榮河、解州、夏縣、平陸、河津、絳縣，全系因該年波及晉陝豫的地震而重築。《明實錄》載稱：「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源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池中，……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八十三萬有奇」，¹²是我國見於文獻記載的傷亡最為慘重的一次大地震。史料記載蒲州城的重建說：「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城壞，河東道趙祖元、知州邊像重修」；¹³曲沃城，「〔嘉靖〕三十四年，知縣張學顏因地震重修」；¹⁴再如絳縣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樓堞傾圮，知縣陳訓復加修葺」；¹⁵又如榮河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城圯，知縣侯祁重築，雉堞俱易以磚，增三門樓，南北各建重門」。¹⁶崇禎年間的築城活動無疑與遍地蜂起的「流寇」有關，如方志記載太平城崇禎四年修築之事稱：「崇禎四年，知縣魏公韓以流寇入境，至城下者三，土牆低薄，採石為基，通甃以磚」；¹⁷記載崇禎十四年絳縣城修築行為稱：「崇禎十四年，知縣王敏增修北城敵臺二座，南門外甕城加高數尺，上建重樓」，¹⁸雖未明言是因「流寇」而增築，但從修築內容上顯明的軍事防禦目的即可明瞭其中之意。

那麼，景泰、嘉靖、隆慶年間大規模的築城高峰是由何種因素促成的？

¹¹〔清〕徐颺廷修，〔清〕徐介纂，〔康熙〕《長子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地理志·城池〉，頁33。

¹²《明世宗實錄》，卷430，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條，頁7429-7430。

¹³〔清〕周景柱纂，〔乾隆〕《蒲州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卷4，〈城池〉，頁2a。

¹⁴〔清〕潘錦纂，〔康熙〕《曲沃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卷6，〈城池〉，頁2a。

¹⁵〔清〕趙士弘修，〔清〕陳所性等纂，〔順治〕《絳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建置·城池〉，頁521。

¹⁶〔清〕楊令琢修，〔清〕王母音纂，〔乾隆〕《榮河縣志》（太原：山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卷2，〈城池〉，頁1a-b。

¹⁷〔清〕張鍾秀纂，〔乾隆〕《太平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1b。

¹⁸〔順治〕《絳縣志》，卷2，〈建置·城池〉，頁521。

現在追索起來，皆與「北虜」大舉搶掠山西腹裏¹⁹有關，這正是下文所要深入討論的所在。

二、「土木之變」後的山西情勢與首次築城高潮

明帝國創立初期，北退塞外的元室餘部依舊保持著強大勢力，與明軍在塞外有多次殘酷較量。洪武二十一年（1388）捕魚兒海之戰，北元大敗，大汗勢力衰微，蒙古各部梟雄迭起，蒙古地區遂陷於分裂割據局面，逐漸分為韃靼、瓦剌、兀良哈和西北諸部，其中，韃靼與瓦剌兩大營壘爭奪蒙古霸權的鬥爭以及蒙古大汗與權臣之間的鬥爭表現得異常激烈，明朝廷則對之採取擊強扶弱的牽制策略，以使蒙古諸部互相消耗，藉此漁翁得利。不過，由於大汗所在的韃靼部始終是明朝廷打擊的重點，瓦剌部得以長時期喘息生聚。正統三年（1438），瓦剌太師脫歡（？-1439）攻殺阿岱汗，立脫脫不花（1416-1452）為可汗（岱總汗）。次年，脫歡卒，其子也先（1407-1455）繼為瓦剌太師，更大規模地向四周擴展，一時統一了蒙古諸部。塞外的暫時統一，使得自明成祖時期即已開始的朝貢貿易由局部、分散的行為變為整個蒙古地區與明朝的貿易。來自蒙古草原的使臣規模呈現愈來愈大之勢，「往者瓦剌遣使來朝多不滿五人，今脫脫不花、也先所遣使臣動以千計，此外又有交易之人」。²⁰這給明朝一方以巨大財政壓力，遂被迫採取固定賞賜數額的措施，增人而不增賞，而這正給也先發兵攻明以藉口。²¹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兵分四路大舉攻明，也先率主力進攻大同，阿剌知院率部進攻宣府，脫脫不花率所部進攻遼東，另有一路進攻甘州。七月十一日，明英宗聽聞大同遭到侵犯，不聽廷臣諫阻，出兵親征。八月初二日至大同，見形勢不利，倉促回師。十五日至土木堡，瓦剌騎兵大至，明軍大潰，死傷數十萬，英宗被俘，朝野大

¹⁹ 明代山西「腹裏」，系指雁門關長城一線以南的廣大區域，這在《明實錄》中多有記載，詳細考證從略。

²⁰ 《明英宗實錄》，卷 88，正統七年正月戊寅條，頁 1764-1765。

²¹ 關於「土木之變」前瓦剌與明朝的矛盾，日本學者和田清已有詳細論述，參見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頁 245-250。

震，是為「土木之變」。九、十月間，也先進而挾英宗進犯北京。十月初四日抵紫荊關，初九日破之。十一日長驅至北京城下，明軍在于謙（1398-1457）指揮下英勇奮戰，也先受挫，五天後自北京撤兵，復經紫荊關、貓兒莊出塞。²²

「土木之變」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蒙古軍隊頻繁騷擾宣府、大同防線，史料記載，景泰元年（1450）正月，「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卻之」。三月，「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是月「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山西北部遂無寧日。²³更為嚴重的是，還出現了蒙古軍隊越雁門關南下山西腹裏搶掠的新態勢。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山陰地方官奏稱：「達賊三千餘騎北行至代州，時各關口既塞，天寒雪深，虜騎不得出，因剽掠繁峙諸縣」，²⁴說明已深入至關南的代州、繁峙一帶。景泰元年四、五月間的蒙古掠晉事件更是前所未聞。是年四月，「達賊數萬自鴉兒崖入境，至廣武站分三路攻雁門關」，²⁵五月掠河曲縣及義井堡，分兵自代州而下。本年七月山西地方官員上奏此次蒙古南掠之事稱：「前者虜寇深入，攻圍忻、代等州、鎮西等衛，直至太原城北」，²⁶可見蒙古軍隊南下擾掠直達了太原城附近。整個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多個州縣在此次事件中遭受嚴重破壞。如河曲縣，五月乙巳「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鑒（1390-1477）奏，達賊數千分道入境，犯河曲縣，殺虜人畜殆盡，越四日始退。」²⁷又如靜樂縣，五月己酉「山西靜樂縣奏報：達賊殺虜男婦八十一口，牛馬驢騾一百四十餘匹，羊六百八十二隻。」²⁸太原城東的壽陽縣也遭到劫掠，七月甲辰「免山西壽陽縣歲辦皮張，以其地遭虜寇侵掠，歲饑民艱也。」²⁹這無疑是明政權建立以來，山西遭到的首次最嚴

²² 吳智和對「土木之變」當時與之後明軍在居庸、紫荊二關的防務問題有深入討論，對於理解此時的明蒙關係大有助益。參見吳智和，〈明景帝監國登極時期居庸紫荊兩關之城防〉，《明史研究專刊》，5（1982），頁279-298。

²³ 〔明〕鄭曉，《皇明北虜考》，收入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1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頁207。

²⁴ 《明英宗實錄》，卷185，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壬寅條，頁3703。

²⁵ 《明英宗實錄附景泰實錄》，卷191，景泰元年四月丙申條，頁3966。

²⁶ 《明英宗實錄附景泰實錄》，卷194，景泰元年七月甲寅條，頁4085。

²⁷ 《明英宗實錄附景泰實錄》，卷192，景泰元年五月乙巳條，頁3984。

²⁸ 《明英宗實錄附景泰實錄》，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己酉條，頁3992。

²⁹ 《明英宗實錄附景泰實錄》，卷194，景泰元年七月甲辰條，頁4072。

重浩劫。

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高峰正是在蒙古軍隊深入山西腹裏的情勢下出現的，如史料載太平縣城歷次修築情況時稱：「正統己巳土木之變，成化甲辰人民相食，嘗大興作」，³⁰記載介休修城說：「明景泰元年知縣王儉、彭鏞復葺之，以備外患。」³¹正統末景泰初，山西全省共有74次城池修築行為，如此大範圍的集中修築活動究竟是如何組織的呢？洪洞修城的記載透露了些許蛛絲馬跡：

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周圍五里奇，高一丈六尺，厚八尺，池深八尺。……景泰初，知縣趙翔重修。³²

引文中的「奉文」二字頗值得重視，這證實當時必有一道高層官員嚴令全省修城的公文。雖然文獻中更多見的是僅記載州縣正印官或僚屬率領修城，但由此並不能否認高層官員曾明令地方統一修城的事實，只是史料未予交待而已。可以設想，當時全省上下必是呈現出一番省級要員嚴令修城、州縣官員嚴格督催、基層百姓無條件參與的築城熱潮。

74次築城行為涉及73座城市，³³比例占到了全省96座治所城市中的76%，可見波及面之廣。其在空間布局上體現出極為明顯的南北分異特徵，太原府城東西一線以南僅有為數極少的9處城池未見修築行為，築城率高達87%；而太原府城以北的25座城池中，僅11處城池有修築活動，築城率為44%。若以雁門關一線將山西劃分為腹裏和邊塞兩個地區，這種南北分異特徵同樣十分明顯，邊塞11城僅有大同、靈丘2城顯示有修城活動，而腹裏地帶的85座城池中有71座經過了修築。這是正統末景泰初蒙古軍隊深入山西腹裏大肆剽掠的典型體現。（參見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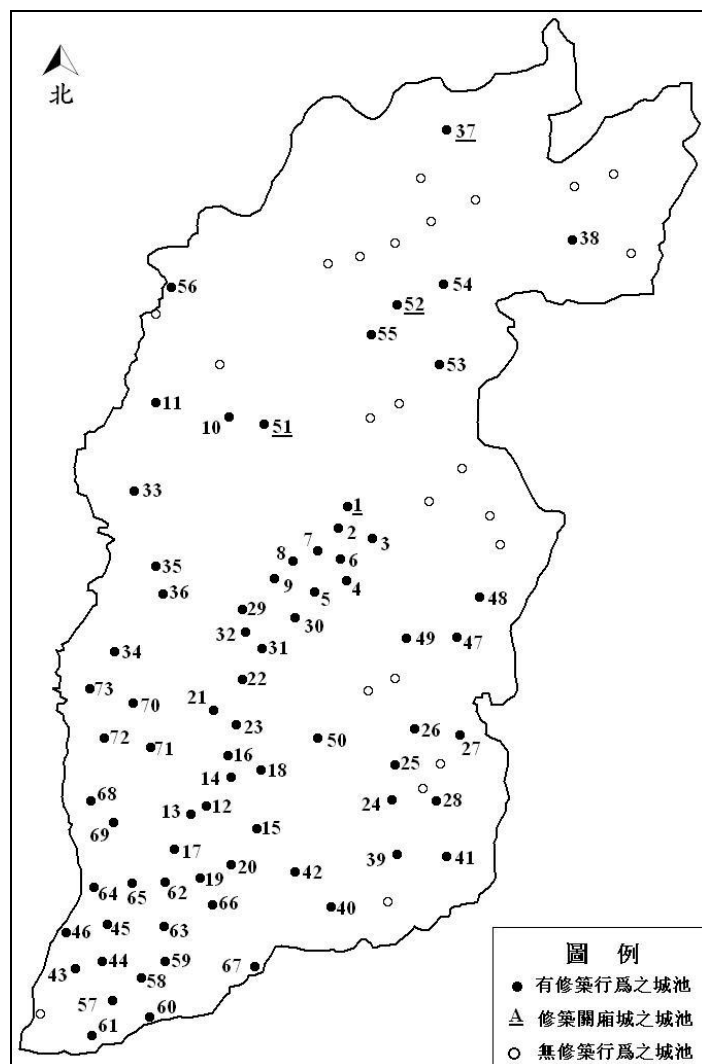
³⁰ [明]李鉞，〈太平縣修城記〉，〔乾隆〕《太平縣志》，卷10，〈藝文志〉，頁19a。

³¹ [清]王埴修，〔清〕王之舟、〔清〕降緯纂，〔康熙〕《介休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卷2，〈建置·城池〉，頁2a。

³² [明]喬因羽修，〔明〕晉朝臣纂，〔萬曆〕《洪洞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卷1，〈輿地志·城池〉，頁11b。

³³ 洪洞城在正統十四年和景泰初年各有1次修築活動。參見〔萬曆〕《洪洞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頁11b。

圖2 正統末景泰初山西築城運動空間布局示意圖



說明：底圖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明代·山西一〉，頁54-55。

注：1.太原府城 2.太原縣城 3.榆次城 4.太谷城 5.祁縣城 6.徐溝城
7.清源城 8.交城城 9.文水城 10.嵐縣城 11.興縣城 12.臨汾城
13.襄陵城 14.洪洞城 15.浮山城 16.趙城城 17.太平城 18.岳陽城
19.曲沃城 20.翼城城 21.汾西城 22.靈石城 23.霍州城 24.長子城
25.屯留城 26.襄垣城 27.黎城城 28.壺關城 29.汾州城 30.平遙城

31.介休城 32.孝義城 33.臨縣城 34.石樓城 35.石州城 36.寧鄉城
 37.大同城 38.靈丘城 39.高平城 40.陽城城 41.陵川城 42.沁水城
 43.臨晉城 44.猗氏城 45.萬泉城 46.滎河城 47.遼州城 48.和順城
 49.榆社城 50.沁源城 51.靜樂城 52.代州城 53.五臺城 54.繁峙城
 55.崞縣城 56.河曲城 57.解州城 58.安邑城 59.夏縣城 60.平陸城
 61.芮城城 62.絳州城 63.聞喜城 64.河津城 65.稷山城 66.絳縣城
 67.垣曲城 68.吉州城 69.鄉寧城 70.隰州城 71.蒲縣城 72.大寧城
 73.永和城

就這73座城池而言，此波修城高峰的工程量如何呢？遺憾的是，此類史料並不完整、系統，但我們若拉長時間的界限，轉換視角，通過考察正統末景泰初首次修城的比例，當能大致瞭解工程量問題。史料中對築城行為的記錄有多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類似洪洞縣城、太原縣城、興縣城的例子，如下所示：

〔洪洞縣城〕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³⁴

〔太原縣城〕縣治初改晉陽城南關，景泰元年知縣劉敏因舊基始築城。³⁵

〔興縣城〕興舊為興州，明初改為縣，未有城池，景泰元年枕山始築土城。³⁶

這是明確記載正統末景泰初乃是首次修城的情況，其工程量之浩大自不待言。第二種方式是如夏縣城、石樓縣城、太平縣城的例子，如下引文所示：

〔夏縣城〕始建於元魏神農元年，景泰初知縣雷縉增築。³⁷

〔石樓縣城〕土城一座創自唐，武德二年築，明景泰元年縣丞耿祥修。³⁸

³⁴ 〔萬曆〕《洪洞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頁11b。

³⁵ 〔明〕高汝行纂修，〔嘉靖〕《太原縣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卷1，〈城池〉，頁5a。

³⁶ 〔清〕程雲修，〔乾隆〕《興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卷15，〈營築·城垣〉，頁1b。

³⁷ 〔清〕蔣起龍纂修，〔康熙〕《夏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1，〈建置志·城池〉，頁93。

³⁸ 〔清〕袁學謨修，〔清〕秦燮纂，〔雍正〕《石樓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1，〈城池〉，頁476。

〔太平縣城〕始唐鄂公敬德堡也，貞觀七年徙縣於此，周圍三里六十五步，高四丈，濠深一丈五尺，東門二，南北西各一，明景泰初知縣岳嵩修。³⁹

此類記載的突出特點是，正統末景泰初年築城與上一次築城相隔時間動輒數百年。該記錄格式的形成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兩次築城確實相隔極長的時間，期間並無修築行為，是史料修撰者據實直書；另一種可能是，期間曾有過多次修築，志書編纂者純為簡化敘述之便，省略不記。對於後者，筆者的觀點是，期間若是對城池的小修小補，則為求簡化而略去不書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工程量較大的大規模修築行為，史料修撰者實無省略不記的理由，這並不符合常理。基於這一分析，可以推想，早先創築的「城池」因長期未經修繕或僅是小修小補，至正統末景泰初年時，很可能已是斷壁殘垣。因此，對於第二種記錄方式，我們大可將發生於正統末景泰初的修築行為視同為首修，其工程量無疑也是較為可觀的。第三種方式即屬對築城活動的詳實記錄，例證如下：

〔石州城〕秦丁巳三年，趙武靈王破林□、樓煩始築。元至元二十一年，河南行樞密院八元愷、郡守尹炳補築。明景泰元年，州守范賓重修。⁴⁰

〔臨汾縣城〕乃魏王豹建，洪武初因舊城重築，景泰初重修。⁴¹

〔襄陵縣城〕宋天聖元年，自宿水店徙治今址，始築土城，周五里一百六十步。元至正二年，縣尹岳貞重築。明正統十四年，知縣趙聰恢拓，為門者三。⁴²

就此種記錄方式而言，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顯然不能視作首修，但將首修分別定為先秦、秦漢之際、北宋亦不甚妥當，原因在於各與下一次築城時間相

³⁹ 〔乾隆〕《太平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1b。

⁴⁰ 〔清〕謝汝霖修，〔清〕朱鈴、〔清〕張永清等纂，〔康熙〕《永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2，〈城池〉，頁26。

⁴¹ 〔清〕邢云路纂，〔康熙〕《臨汾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據明萬曆十九年[1591]刻本增刻），卷1，〈地理志·城池〉，頁4b。

⁴² 〔清〕趙懋本修，〔清〕盧秉純纂，〔雍正〕《襄陵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卷5，〈城郭〉，頁1a。

隔過長。穩妥的做法是，將石州、襄陵二城的首修時間定為元代，將臨汾城定在洪武初。此種記錄方式所揭示的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工程量一般是較小的。

綜合以上論述，筆者對正統末景泰初年所修73座城池的首修時間作了匯總統計，參見表二：

表二 正統末景泰初73座城池首修時間一覽表

首修時間	城池名稱
元 代	交城、襄陵、岳陽、翼城、汾西、靈石、霍州、長子、屯留、黎城、汾州、石州、高平、萬泉、滎河、遼州、和順、沁源、崞縣、河曲、解州、聞喜、河津、大寧、永和
洪 武	太原府、臨汾、曲沃、襄垣、壺關、平遙、臨縣、大同、沁水、靜樂、代州、芮城、絳州
宣 德	榆社
正統間	陵川
正統末 景泰初	太原縣、榆次、太谷、祁縣、徐溝、清源、文水、嵐縣、興縣、洪洞、浮山、趙城、太平、介休、孝義、石樓、寧鄉、靈丘、陽城、臨晉、猗氏、五臺、繁峙、安邑、夏縣、平陸、稷山、絳縣、垣曲、吉州、鄉寧、隰州、蒲縣

資料來源：成化、嘉靖、萬曆、康熙、雍正、光緒《山西通志》、百餘種山西明清府州縣志、《明實錄》。

說明：史料記載陵川縣城在正統景泰年間凡有兩次修築行為，首次在「正統間」，後次在「景泰初」，因首次修築並不能確定是在「正統末」，為穩妥起見，姑認定為「正統間」。

表二顯示，正統末景泰初凡有33座城池係首次修築，大大超過洪武年間的13座，雖然元代首修的城池有25座，數量亦較為可觀，但在時間段上卻相對分散，遠不如正統末景泰初集中。至此可以認為，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運動，不僅在築城數量上十分可觀，在工程量方面也是空前的。經過正統末景泰初的築城高峰，山西完整的城池體系基本上得以奠定。

三、嘉靖中期蒙古「大入」山西與築城浪潮的再起

正統年間也先雖實現了蒙古各部的統一，但由於缺乏穩固的政治經濟基礎，蒙古草原很快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境況中。先是也先殺脫脫不花汗，隨後阿剌知院殺也先，瓦剌勢力由此衰落，韃靼復起，但蒙古大權又落入韃靼喀喇沁部領主孛來和翁牛特部領主毛里孩手中，大汗和異宗權臣之間的爭鬥依舊激烈。景泰五年（1454），孛來立脫脫不花次子馬可古兒吉思為可汗，稱烏珂克圖汗。成化元年（1465），孛來殺烏珂克圖汗。二年，毛里孩起兵攻殺孛來，立脫脫不花長子摩倫為可汗。不久，毛里孩復殺摩倫汗。此後，脫脫不花的季弟滿都魯與其侄孫巴延蒙克（脫脫不花從弟阿噶巴爾濟之孫，明人稱之為孛羅忽）合兵大敗毛里孩。十一年，滿都魯被永謝布領主札加思蘭立為可汗，札加思蘭仗勢擅權。十五年，亦思馬因殺札加思蘭，收攬大權，是年，滿都魯去世，無子嗣，汗位繼承權遂落到先已亡故的巴延蒙克的遺孤巴圖蒙克（1474-1517）身上。十六年，巴圖蒙克繼汗位，稱達延汗（明人亦稱之為小王子）。當時的韃靼地區主要由六萬戶⁴³組成，分左右翼，左翼三萬戶稱為察哈爾、喀爾喀和兀良哈，右翼三萬戶稱為鄂爾多斯、土默特和永謝布。此時的達延汗名義上是全蒙古的大汗，但直屬部只有察哈爾萬戶，其他五萬戶均由異宗權臣領有，除左翼的喀爾喀和兀良哈聽其指揮外，右翼三萬戶與達延汗是敵對的狀態。至正德五年（1510），達延汗率左翼三萬戶在達蘭特哩袞與右翼三萬戶交戰，右翼兵敗，遂收復右翼三萬戶。此後，達延汗繼續打擊和收降未服從的蒙古部落，並不時派兵抑制瓦剌領主的反抗，最終統一了整個蒙古地區。統一蒙古後的達延汗，一改過去由異宗領主分統蒙古諸部的狀況，除瓦剌及個別地區外，廢除異宗領主、權臣的領地，封諸子分領六萬戶。大汗為全蒙古最高君主，駐牙於察哈爾萬戶，統率左翼三萬戶；濟農駐帳於鄂爾多斯萬戶，統率右翼三萬戶。達延汗的分封制度形成了由達延汗子孫統治大漠南北的狀況，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十二年，達延汗去世，其子右翼濟農巴

⁴³ 萬戶，蒙語稱作土綿，亦稱兀魯斯，是一個大的部落集團，也是一塊大領地，每一萬戶又由若干鄂托克組成。

爾斯博羅特主政。十四年，巴爾斯博羅特卒，子袞必里克嗣右翼濟農之位（明人以其職位稱袞必里克為吉囊）。在巴爾斯博羅特諸子中，以袞必里克和俺答勢力最強，二人不相上下。袞必里克佔有富饒的河套及以西的大片豐美草原，俺答最初佔有開平以北地區，較貧瘠，後以豐州灘為根據地，向四方擴展，條件大為改善。袞必里克晚年放縱酒色，不理軍政，濟農勢力遂衰，俺答相應崛起，控制了右翼三萬戶，兵馬雄冠諸部。⁴⁴

在游牧與農業兩種社會間，北方游牧民族因自然環境及生活方式的限制，在經濟上不得不依賴於南方的農業民族，這決定了兩者之間必須有貿易存在，貢市貿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俺答時期，蒙古地區的社會秩序漸趨穩定下來，對明朝的通貢互市需求日漸提升，倘若遭遇風雪災害、蝗災、疫病等，這種貿易需求會變得更為迫切。嘉靖十三年（1534），「其四月，俺答挾眾欲入貢」，⁴⁵這是文獻記載中俺答最早提出的入貢要求。令人遺憾的是，明朝世宗皇帝一味執行錯誤的絕貢政策，朝中雖有大臣主張接受俺答通貢互市需求，但面對剛愎自用的明世宗，終不敢冒險進諫。求貢不得的俺答，遂有對明朝的頻繁搶掠之舉，明帝國的邊防危機由此日趨嚴重，緊鄰俺答活動重心的山西一帶自然成為邊患的重災區。

不過，在嘉靖十九年（1540）以前，極少發生蒙古軍隊越過雁門關一線而深入腹裏的事件，即便偶爾逾關南進，亦未出現景泰元年到達太原城北的嚴重狀況。變化從嘉靖十九年之時開始出現了，是年八月俺答衝破寧武關，大舉入掠山西腹裏。《明世宗實錄》載：

給事中張良貴勘上十九年虜犯山西失事狀：言虜以八月七日自寧武關狗兒澗水口進入，尚犯岢嵐州及靜樂、嵐、興等縣、鎮西等衛，所殺鹵居民以萬計，搶掠財蓄不可勝算，延住內地十餘日，以本月十六日復由狗兒澗出邊。⁴⁶

《晉乘蒐略》對此次蒙古深入山西的事件記載更為詳細，其稱：「嘉靖十九

⁴⁴ 此部分對蒙古政治變遷史的論述，參考楊紹猷，《俺答汗評傳》，頁14-22。

⁴⁵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薄音湖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4輯，卷7，〈中三邊一·俺答列傳上〉，頁38。

⁴⁶ 《明世宗實錄》，卷252，嘉靖二十年八月癸未條，頁5064。

年八月，諳達（即俺答——筆者注）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寧武關，入岢嵐、興縣，遂入太原及交城、汾州、文水、清源。」⁴⁷兩則史料揭示，蒙古南進山西腹裏乃是自寧武關而入，經晉西北之岢嵐、興縣、嵐縣、石州而入晉中，包括太原盆地之內的多處州縣遭到劫掠，最遠到達汾州，這顯然已是有明以來蒙古南掠山西最遠的一次了。不過，嘉靖二十年的掠晉事件很快刷新了這一記錄。是年，蒙古高原「人畜多災疾」，對其社會經濟產生嚴重打擊，俺答遂有入貢之舉，於八月遣石天爵等人至大同陽和塞請通貢市，聲稱如若明廷不許，「即徙帳比鄙，而縱精騎南掠去」，實際上乃是以戰逼市之舉。⁴⁸明廷果然拒絕其通貢之請，俺答、衮必里克遂於八、九月間率眾先後入犯。俺答之兵首先入掠，其攻破太原盆地北端的石嶺關，徑趨太原，然後揮兵東向，攻掠「平定州、壽陽、盂縣諸處，勢逼真定境上」，大有破井陘深入華北大平原的勢頭，明軍不得不由紫荊關分兵至井陘防禦。⁴⁹隨後，衮必里克自大同平虜衛入掠，「長驅入寧武關，而興、嵐、紛、石之間再遭屠剝」。⁵⁰方志記載俺答兵僅在太原縣就掠殺二萬人：「〔嘉靖〕二十年秋八月，北虜擁眾十七萬，搶殺本縣鄉村人口二萬，牲畜無算。」⁵¹史料言及八月俺答殺掠之慘曰：「八月間，被醜虜俺答阿不孩深入數百里殺掠，極人煙斷絕。」記載衮必里克入掠之狀說：「地方傷殘之慘，當不啻八月，真可痛心扼腕。」⁵²明廷對於明蒙兩方的損失有詳細統計：

去歲（嘉靖二十年）虜再深入山西，大掠岢嵐、石州、忻、平、壽陽、榆次、陽曲、太原等州縣，宗室被鹵者四人、儀賓一人，軍民被殺鹵者五萬一千七百餘人，諸所焚掠無算，而我兵先後斬獲僅三百九十三級。⁵³

51700：393！極不對稱的損失比率折射出山西受創之慘烈。更嚴重的危機在

⁴⁷〔清〕康基田著；衛廣來點校，《晉乘蒐略》（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卷30上，頁2322。

⁴⁸《明世宗實錄》，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條，頁5030。

⁴⁹《明世宗實錄》，卷252，嘉靖二十年八月甲子條，頁5048。

⁵⁰《明世宗實錄》，卷254，嘉靖二十年十月癸丑條，頁5101。

⁵¹〔嘉靖〕《太原縣志》，卷3，〈祥異〉，頁3b。

⁵²《明世宗實錄》，卷254，嘉靖二十年十月癸丑條，頁5101。

⁵³《明世宗實錄》，卷258，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庚午條，頁5171。

嘉靖二十一年接踵而至。此年蒙古地區疫病流行更為嚴重，史料記載說：「嘉靖壬寅，虜中疾疫，死者亦復過半。」⁵⁴無奈之下，俺答復遣石天爵等人求通貢市，最終石天爵反被明官誘殺，俺答大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眾入寇」。⁵⁵其自朔州經廣武一路南下，在晉中一帶大肆殺掠，更進一步南下至潞安、平陽二府之境，整個山西由北到南幾乎橫掃一遍。《晉乘蒐略》綜合前代史料，對此次蒙古入掠經過有詳實記錄：

嘉靖二十一年，諳達糾青台吉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由左衛吳家口入駐朔州，掠廣武，南入太原，薄太原城。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霜雪，士民惶恐內徙。知府張祉冒雨登陴，晝夜巡警，敵不得逞。城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士以矢石火器斃寇數十人。寇焚演武教場，乃移營南走，轉掠祁、清等縣，駐帳縣北三日。抵清源城，冀寧道王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轉入太原城，屠戮四萬餘人，大掠十日。南掠平遙，復至太谷，攻破郭村堡。轉至介休城下，破石屯、王里二堡。掠沁、潞而還，至永寧州城下，渡河北返。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僇男女二十餘萬，焚公私廬舍八萬餘區，蹂躪田禾、殺掠牛馬羊豕無數。七月庚午始出。⁵⁶

嘉靖二十二年朝臣在查勘「山西諸臣失事罪狀」的奏疏中言：

虜自去年六月十八日進邊，至七月二十二日始出，自來流連內境未有若是之久！其所殘破衛所十餘，州縣三十有八，西至河湓，東掠平定、沁、遼，南入洛安、平陽之境，縱橫不啻千里，自來蹂躪地方未有若是之廣！殺鹵男女十餘萬人，搶劫馬牛畜產財物器械至不可勝紀，其不可言之慘未有若是之甚！⁵⁷

一組「未有若是」的排比句，深刻揭示出嘉靖二十一年蒙古掠晉之慘，無論是入掠時間，還是波及範圍，抑或明朝一方的生命財產損失，均大大超過嘉

⁵⁴ [明] 岷峨山人，《譯語》，收入薄音湖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第1輯，頁246。

⁵⁵ 《明世宗實錄》，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戊辰條，頁5210。

⁵⁶ [清] 康基田，《晉乘蒐略》，卷30上，頁2328-2329。

⁵⁷ 《明世宗實錄》，卷271，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乙亥條，頁5333。

靖二十年。這是明代山西遭受的最大一場浩劫！

嘉靖年間邊患孔亟，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嘉靖十九至二十一年蒙古多次掠晉事件可為嘉靖「北虜」為患的巔峰之一。面對蒙古穿堂入室般的頻繁深入，嘉靖十九年山西巡撫⁵⁸陳講曾急令全省修築城池以防不測，新一輪築城高潮乃由此而起。史料稱：

嘉靖庚子秋，匈奴寇邊，及我樓煩，……時巡撫大中丞中川陳公亟下令，言：備於未然，斯無患其來，今郡縣外無河山之險，內寡藩垣之固，奈何用戒不虞哉！其議所以繕城郭、築堡寨毋緩。⁵⁹

嘉靖庚子即嘉靖十九年，正當蒙古首次大規模入掠山西腹裏之時。另有史料記載：「嘉靖庚子秋，諸郡廷議修城」，⁶⁰「庚子入岢嵐，巡撫陳公檄下郡邑，俾各修城堡防護」。⁶¹所言無疑均是指陳講嚴令全省修城之事。巡撫以下，多見分守道、分巡道官員督責州縣官修城。這正是明代中後期巡撫之官行使職權的既定路徑——即其並非通過指揮都、布、按三司來行事，而是經由所撫地區的道來開展工作。⁶²是年，冀南分守道于敖曾督修汾州東關城和孝義南關城：「〔汾州〕東關城，明嘉靖十九年，冀南分守道岷州于公令知州張琯修築」⁶³。「〔孝義城〕南門外有堡牆，其外自南繞西有外堡牆，皆嘉靖間分守冀南道于敖因邊警所築。」⁶⁴嘉靖二十年，冀寧分巡道郭春震檄令修築文水

⁵⁸ 明代山西巡撫始置於正統十四年，管轄除大同府以外的山西全境，即本文所言的山西「腹裏」。參見郭紅、靳潤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744-746。

⁵⁹ 〔明〕孔天胤，〈汾東關建城記〉，收入〔清〕李文起修，〔清〕戴震等纂，〔乾隆〕《汾陽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刻本），卷12，〈藝文〉，頁19a-b。

⁶⁰ 〔明〕苟汝安，〈重修東關古城記〉，收入〔清〕李榮和、〔清〕劉鍾麟，〔清〕張元懋纂，〔光緒〕《永濟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卷19，〈藝文〉，頁9a。

⁶¹ 〔明〕高汝行，〈徐溝縣新築北關城碑記〉，收入〔清〕王嘉謨纂，〔康熙〕《徐溝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卷4，〈藝文〉，頁16a。

⁶² 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92。

⁶³ 〔清〕吳世英修，〔清〕劉文德纂，〔順治〕《汾陽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1657]刻本），卷1，〈土地志·疆域·城池〉，頁14a。

⁶⁴ 〔清〕孫和相修，〔清〕戴震纂，〔乾隆〕《汾州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城：「嘉靖二十年，巡道郭春震檄祁縣丞李爵復修之，倍高四尺，建堞臺一十有六。」⁶⁵同年，冀甯分守道王儀督令州縣官或僚屬修築平定、壽陽、榆次三城：「〔平定州城〕嘉靖二十年，寇迫城下，參政王儀督知州周尚文興修」，⁶⁶「〔壽陽城〕嘉靖間蒙古犯境，分守參政王儀檄令縣丞徐廷增高益厚，葺飭三門」，⁶⁷「〔榆次城〕嘉靖二十年，俺答入寇，參政王儀檄知縣李鵬重葺之」。⁶⁸有分巡道官員還親自參與築城活動，武鄉城就是一例：「〔嘉靖〕二十一年，巡道陳耀為寇患議築南城，……親督城下，期月告成。」⁶⁹當然，更多見的還是州縣官員直接主持的築城活動，如石州城：「嘉靖二十年被掠之後，州守楊潤增修。」⁷⁰嵐縣城：「嘉靖二十年知縣張崇德因十九年大遭兵燹，又增築之。」⁷¹屯留城：「〔嘉靖〕二十一年，知縣任肅因寇亂，復高城深池丈許，改瓶城為方城，周圍築敵臺八。」⁷²徐溝城：「〔嘉靖〕二十二年，知縣周誥覩城上女牆傾圯，并值辛丑、壬寅二歲有邊驚，因易以磚堞，又創角樓四座。」⁷³

在地方官府「自上而下」的嚴格督催之下，嘉靖十九年凡有8座城池得到了修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分別達至15次和16次之多，二十二年蒙古雖未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卷5，〈城池·孝義縣城〉，頁5a。

⁶⁵〔清〕傅星修，〔清〕鄭立功纂，〔康熙〕《文水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卷2，〈地利志·城池〉，頁10b。

⁶⁶〔清〕金明源修，〔清〕竇忻、〔清〕張佩芳纂，〔乾隆〕《平定州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卷4，〈建置志·城池·下城〉，頁2b。

⁶⁷〔清〕吳祚昌纂，〔康熙〕《壽陽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8a。

⁶⁸〔清〕錢之青修，〔清〕張天澤、〔清〕王系纂，〔乾隆〕《榆次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卷2，〈城池〉，頁2a。

⁶⁹〔清〕姚學瑛修，〔清〕姚學甲纂，〔乾隆〕《沁州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卷2，〈城池·武鄉縣〉，頁5a。

⁷⁰〔康熙〕《永寧州志》，卷2，〈城池〉，頁26。

⁷¹〔清〕沈繼賢修，〔清〕常大升纂，〔雍正〕《重修嵐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卷2，〈城垣〉，頁1b。

⁷²〔清〕屠直纂修，〔康熙〕《屯留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1，〈城池〉，頁480。

⁷³〔康熙〕《徐溝縣志》，卷1，〈建置·城池〉，頁9b。

再入山西腹裏，因防備「虜患」而築城的次數依舊高達7次，四年合計為46次。在整個嘉靖年間的153次築城活動中，有具體年代可考者為137次，除嘉靖三十四年之外，⁷⁴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的築城頻率大大高於時期內的其他年分，與蒙古掠晉形勢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46次築城活動共涉及40座城池。⁷⁵從其空間布局態勢來看，雁門關以北的邊防地帶依舊是築城稀疏區，僅靈丘一城顯示有築城活動：「嘉靖二十年，因邊外入警，知縣劉永明重修。」⁷⁶築城率之所以如此之低，極可能與修城動議提出者——山西巡撫陳講——的轄區僅限於雁門關以內的腹裏地帶有關。相較之下，山西中部一帶成為集中築城區，該區域內有修築行為的19座城池呈現為「～」狀布局態勢，⁷⁷僅有介休、清源2城沒有築城活動，築城率高達91%。晉中地區連續三年均是蒙古軍隊蹂躪最為頻繁的所在，故而造成了如此高的築城率。晉南與晉東南的築城率明顯低於晉中一帶，但卻遠遠高於邊塞地區，這與此四年中蒙古曾經掠及兩地有直接關係。（參見圖3）

嘉靖中期築城運動的工程量是十分浩大的，這從每座城池的修築明細中即可得見。具體修築內容豐富且多樣，戰備色彩十分明顯，增城牆、甃磚石、建敵臺、創角樓、砌垛口、濬城壕、築關廂城等，不一而足。一個突出的特徵顯而易見，即太原盆地內的築城工程量最為可觀。此外，此波築城，關廂城的修築頗引人矚目，40處城池中有15處存在修築關廂城的情況，汾州一城修築有2座關廂城，故而關廂城的實際數量為16座，且絕大部分系創築，而非重修。這是頗值得討論的重要課題。（詳見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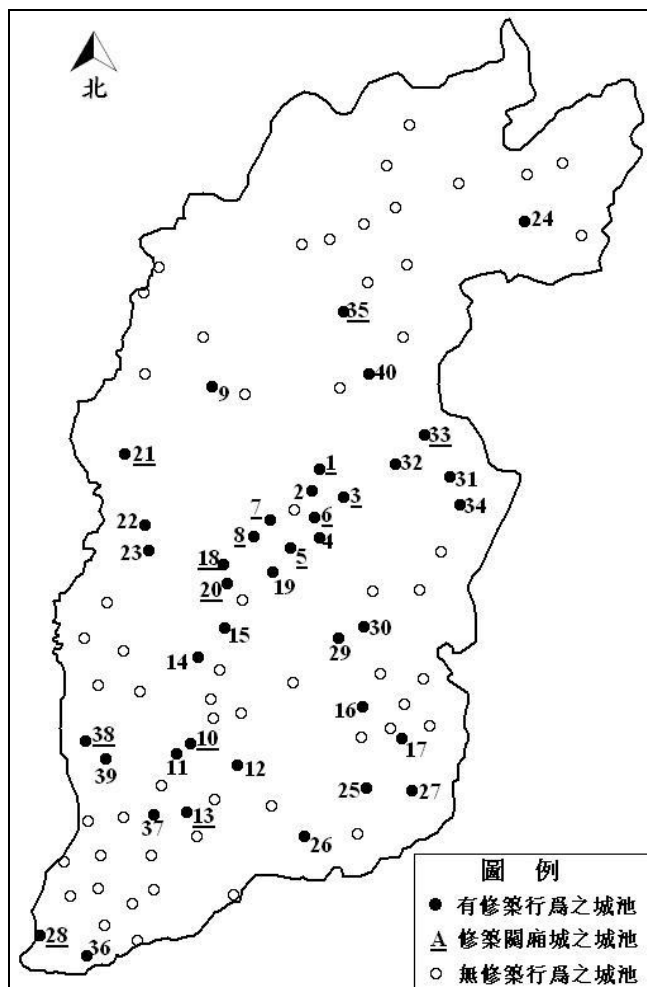
⁷⁴ 嘉靖三十四年因晉南地震，該年有9次築城活動，這已在上文中予以交待。

⁷⁵ 榆次、徐溝、交城、文水、汾州、沁州6城在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的四年中各自有2次築城行為，故為40座。

⁷⁶ [清]岳宏譽纂，[康熙]《靈丘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卷1，〈建置志·城池〉，頁27a。

⁷⁷ 19座城池為：太原府城、太原縣城、榆次城、太谷城、祁縣城、徐溝城、交城城、文水城、靈石城、汾州城、平遙城、孝義城、臨縣城、石州城、寧鄉城、平定州城、壽陽城、盂縣城、樂平城。

圖3 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山西築城運動空間布局示意圖



說明：底圖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明代·山西一〉，頁54-55。

注：1.太原府城 2.太原縣城 3.榆次城 4.太谷城 5.祁縣城 6.徐溝城

7.交城城 8.文水城 9.嵐縣城 10.臨汾城 11.襄陵城 12.浮山城

13.曲沃城 14.汾西城 15.靈石城 16.屯留城 17.壺關城 18.汾州城

19.平遙城 20.孝義城 21.臨縣城 22.石州城 23.寧鄉城 24.靈丘城

25.高平城 26.陽城城 27.陵川城 28.蒲州城 29.沁州城 30.武鄉城

31.平定州城 32.壽陽城 33.盂縣城 34.樂平城 35.崞縣城 36.芮城城

37.絳州城 38.吉州城 39.鄉寧城 40.定襄城

表三 嘉靖十九至二十二年築城工程量一覽表

城池名稱	修築明細	資料來源
太原府城	重修南關城：周圍5里，高2丈5尺，門5	〔明〕關廷訪修，〔明〕張慎言纂，〔萬曆〕《太原府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卷5，〈城池・太原府城〉，頁16
太原縣城	更加補葺，又外增敵臺32座	〔嘉靖〕《太原縣志》，卷1，〈城池〉，頁5a
榆次城	主城增高5尺，廣1尺，撤土甃磚，置敵臺20，角樓4，警鋪16，池外復列垣為蔽；創築南關城：周547丈，高1丈9尺，廣1丈2尺，池闊2丈，深丈餘，上置樓櫓、雉堞	〔乾隆〕《榆次縣志》，卷2，〈城池〉，頁2a、5a
太谷城	愈增高厚，於東、北二門創甃城，西、南各設重門，每面築敵臺6座，上構樓各2楹，深濬城壕	〔清〕喬允升纂，〔順治〕《太谷縣志》（清順治十二年[1655]據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刻版重修），卷1，〈輿地志・城池〉，頁5b
祁縣城	創築西關城：周2里，高2丈5尺，底闊2丈，頂闊1丈，陴牆高5尺，門5，敵臺8座，西、南、北三面各濬壕一道，深1丈，闊3丈	〔清〕陳時纂，〔乾隆〕《祁縣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卷2，〈城池〉，頁20a-b
徐溝城	主城磚甃女牆，創角樓4座；創築北關城	〔康熙〕《徐溝縣志》，卷1，〈建置・城池〉，頁9b
交城城	主城增高5尺，補築坍塌者約10餘丈，築樓1座；創築東關城：周2里許，高2丈1尺，根厚1丈，頂闊9尺，塹深1丈，廣1丈	〔清〕夏肇庸修，〔清〕許惺南纂，〔光緒〕《交城縣志》（清光緒八年[1882]刻本），卷3，〈建置門・城關〉，頁4b、5b
文水城	主城加高4尺，建敵臺16座，修東、西2門，城外列垣為蔽；創築南關城：周3里7分，高3丈，基闊3丈，頂闊1丈，門4，濠深1丈，廣1丈	〔康熙〕《文水縣志》，卷2，〈地利志・城池〉，頁10b、11b
嵐縣城	增築城池，高3丈，濠深2丈（原城周4里，高1丈5尺，濠深1丈）	〔雍正〕《重修嵐縣志》，卷2，〈城垣〉，頁1b
臨汾城	重修東關城：周1264丈，高2丈5尺，上廣9尺，下基2丈，敵臺8座，門7	〔康熙〕《臨汾縣志》，卷1，〈地理志・城池〉，頁4b-5a

襄陵城	增修城池，高3丈，下闊2丈，上闊1丈，門3，各有郭門	〔雍正〕《襄陵縣志》，卷5，〈城郭〉，頁1b
浮山城	重修城門	〔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浮山縣〉，頁249
曲沃城	創築外城：自舊城東北、西南二角接築，高2丈5尺，厚如之，周6里50步，垛口470，炮臺25座，門6	〔康熙〕《曲沃縣志》，卷6，〈城池〉，頁1b-2a
汾西城	重修城池，鑄火器	〔清〕蔣鳴龍修，〔清〕傅南宮纂，〔康熙〕《汾西縣志》（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卷2，〈城池〉，頁1b
靈石城	重修城池	〔康熙〕《靈石縣志》，卷1，〈地理・城池〉，頁6a
屯留城	城增高丈許，池加深丈許，改瓶城為方城，築敵臺8座	〔康熙〕《屯留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1，〈城池〉，頁480
壺關城	磚甃城牆，計高3丈5尺，垛口845	〔清〕茹金等纂，〔道光〕《壺關縣志》（清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卷3，〈建置志・城池〉，頁1b
汾州城	創築東關城：周9里，高3丈，門6；創築南關城：周5里13步，高3丈，門4	〔順治〕《汾陽縣志》，卷1，〈土地志・疆域・城池〉，頁14a
平遙城	補築河水沖毀之城角	〔清〕王綬修，〔清〕康乃心纂，〔康熙〕《重修平遙縣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1b
孝義城	創築南關城	〔清〕鄧必安纂，〔乾隆〕《孝義縣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卷1，〈城池疆域・城池圖說下〉，頁4b-5a
臨縣城	拓築外城：制高3丈，闊1丈5尺，周圍5里3分，甕城、門樓、敵臺、垛口、腰鋪俱備	〔清〕楊飛熊修，〔清〕崔鶴齡、〔清〕李思豫纂，〔道光〕《臨縣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據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版增刻），卷2，〈建置志・城池〉，頁2a
石州城	增修城池，周9里3步，高3丈5尺，壕深1丈2尺，門3	〔康熙〕《永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2，〈城池〉，頁26

寧鄉城	創築敵臺	〔清〕呂履恒纂，〔康熙〕《寧鄉縣志》（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卷2，〈地理·城池〉，頁4a
靈丘城	重修城池，高厚倍加	〔康熙〕《靈丘縣志》，卷1，〈建置志·城池〉，頁27a
高平城	增角樓4座，敵臺40座	〔清〕范繩祖修，〔清〕龐太樸纂，〔順治〕《高平縣志》（清順治十五年[1658]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1b
陽城城	易以磚堞	〔清〕項龍章修，〔清〕田六善纂，〔康熙〕《陽城縣志》（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卷2，〈營建志·城池〉，頁1b
陵川城	建門樓3座	〔清〕朱樟纂，〔雍正〕《澤州府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卷16，〈營建志·城池·陵川縣〉，頁3a
蒲州城	重建東關城	〔清〕劉榮修，〔清〕孔尚任等纂，〔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蒲州〉，頁107
沁州城	建門樓2座，城樓3間；於敵臺上建更樓27座，每座3間	〔乾隆〕《沁州志》，卷2，〈城池〉，頁1b
武鄉城	築南面城牆，以石為基，周3里，高丈餘	〔清〕高鉞修，〔清〕宋蒼霖等纂，〔康熙〕《武鄉縣志》（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卷1，〈城池〉，頁18b
平定州城	重修上、下城，樓櫓、水門、城門、溝池均有重修	〔乾隆〕《平定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頁2a-b
壽陽城	增高益厚，葺飭三門	〔康熙〕《壽陽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8a
盂縣城	重修主城，高3丈3尺，厚2丈，濠深2丈7尺（原高2丈5尺，厚1丈2尺，壕深2丈）；創築東關城：周5里4分，高2丈，厚丈餘，濠深2丈，門4	〔清〕馬廷俊修，〔清〕吳森纂，〔乾隆〕《盂縣志》（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卷4，〈建置志·城池〉，頁2a-3a
樂平城	建南門樓3間，廣深濠塹，立敵樓，設吊橋	〔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樂平縣〉，頁268

崞縣城	加高增厚南關廂城：周3里餘	〔清〕顧弼纂，〔乾隆〕《崞縣志》（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卷1，〈城池〉，頁2a
芮城城	增敵臺，濬池隍	〔清〕言如泗修，〔清〕莫溥等纂，〔乾隆〕《解州芮城縣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卷3，〈城池〉，頁1a
絳州城	睥睨易之以磚	〔清〕劉顯第修，〔清〕陶用曙纂，〔康熙〕《絳州志》（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卷1，〈地理·城池〉，頁6b
吉州城	增建外城：周4里，皆壘以大石，門四，東、西各建層樓，北建小樓，東門外城前築甕城	〔清〕吳葵之修，〔清〕裴國苞纂，〔光緒〕《吉州全志》（民國初年鉛印本），卷1，〈城池〉，頁19a-b
鄉寧城	增築城池，南城建樓	〔明〕焦守己纂修，〔清〕侯世爵續纂修，〔順治〕《鄉寧縣志》（清順治七年[1650]據明萬曆二十年[1592]刻版增刻），卷1，〈輿地志·城池〉，頁6b
定襄城	城垣增高至4丈（原高2丈5尺），池深1丈5尺	〔明〕李維楨修，〔萬曆〕《山西通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4，〈武備上·城池〉，頁453

說明：表三「資料來源」一欄，除特別注明者外，藏所均為「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四、隆慶元年蒙古掠晉與山西築城高潮的三現

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降的明蒙關係依舊主要在求貢與拒貢的背景下展開。二十五年五月，俺答派遣「堡兒塞等三人款大同左衛塞求貢」，⁷⁸結果被大同總兵的巡邊家丁董寶等殺害冒功；同年七月，俺答又「遞至有印番文一紙，且言欲自到邊陳款」，⁷⁹準備親自到明朝邊地求貢，又被明世宗拒絕。二十六年「自冬春來，（蒙古）游騎信使款塞求貢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⁸⁰

⁷⁸ 《明世宗實錄》，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條，頁5835。

⁷⁹ 《明世宗實錄》，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條，頁5862。

⁸⁰ 《明世宗實錄》，卷322，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條，頁5983。

但最終一一被明世宗拒絕。二十七、二十八，均提出通貢請求，均被明朝拒之。求貢不成而入掠，遂成為此一時期明蒙戰端頻開的主要動因。《明實錄》載俺答之語曰：「以求貢不得，故屢搶。許貢，當約束部落不犯邊。」⁸¹這揭示出蒙古方面以戰求和的真正用意，二十九年俺答攻圍京師的「庚戌之變」正是其以戰逼和的軍事舉動。三十年，明廷被迫同意開放互市，但至次年即被叫停，明蒙雙方又開始了長達20年的戰爭，直至隆慶五年（1571）「隆慶和議」始達成。

就山西一省而言，嘉靖二十一年之後，蒙古擾犯山西的次數沒有絲毫減輕，但波及的主要區域多限於雁門關以北的邊塞地帶，僅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十二年（1553）、三十九年（1560）發生過逾關南進的事件，其中以三十九年破壞最甚。是年九月，俺答大舉入掠，大同總兵劉漢南保應州，對方乘機自朔州移營而南，攻盤道梁堡，越關大入，此時駐紮寧武的山西鎮總兵王懷邦計無所出，避走太原。從《晉乘蒐略》的記載來看，明蒙雙方曾在太原城外交戰，但蒙古軍隊並未取得明顯優勢，「寇懼，夜半遁」，⁸²可見南下之遠。《萬曆武功錄》記述此次南掠事件說：「俺答引六萬餘騎從拒牆堡直搗雁門關、崞縣，破寨堡凡一百餘所，殺萬餘人，略畜產亡算。」⁸³損失已可謂慘重了，但綜合比較，並不能與嘉靖十九至二十一年諸次入掠行為相提並論。

不過，隆慶元年（1567）的蒙古掠晉事件重又成為一次少有的大災難。本次南掠完全是由趙全策動的。趙全乃是嘉靖三十三年由晉北逃入蒙古地區的白蓮教徒，以其「多略善謀」，⁸⁴漸受俺答寵用，「俺答每欲盜邊，先擊牛酒，（趙）全眾計定，乃行」，⁸⁵可見對趙全極為倚重的程度。先是隆慶元年趙全引蒙古兵攻掠薊州一帶，被明軍守將譚綸（1520-1577）大敗。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臺垣固，所征卒常選，攻之倖未易入，晉中兵弱，亭障希〔稀〕，

⁸¹ 《明世宗實錄》，卷347，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丁巳條，頁6292。

⁸² 〔清〕康基田，《晉乘蒐略》，卷30下，頁2392。

⁸³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中三邊一·俺答列傳中〉，頁70。

⁸⁴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8，〈中三邊二·俺答列傳下〉，頁79。

⁸⁵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8，〈中三邊二·俺答列傳下〉，頁80。

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⁸⁶俺答聞而心動，遂率眾六萬，分四路，自井坪、朔州、老營、偏關等地侵入，邊將不能禦，長驅而至石州，營於石州城北，命騎兵至城下索賄，知州王亮采召集富民相商未果，最終「石州遂陷，屠戮甚慘」。⁸⁷史料記載石州之戰曰：

次日（即九月十三日——筆者注）卯刻，賊眾大至，聲振天地，四面重圍。近城壕皆精兵，鐵盔覆首，鐵甲連足，矢石加身不動。城下散卒，執杆鉤垛，尖鏑掘城。州眾多被箭傷，亮采閉門不出。諸達責輸金一萬兩，緞三千匹，眾議不決。諸達怒，圍攻益急，矢下如雨。兵眾四散，遂相攀而上，城陷，亮采沒於署。⁸⁸

次年，明廷因此次事件而「改山西石州為永寧州」，⁸⁹可見石州受創之慘。自石州城破之後，「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算，所過蕭然一空，死者相藉」，⁹⁰「山西騷動」。⁹¹蒙古兵自九月入邊，至十月八日始出邊，在山西搶掠前後達三十餘日。從掠及地域來看，實際遠不止上述州縣，這從隆慶元年十一月明廷因「虜患」免除州縣正官朝覲的詔令中即可得見：

免北直隸、山西虜所殘破州縣昌黎、盧龍、撫甯、樂亭、文水、交城、清源、祁、霍、石、汾州、孝義、介休、平遙，虜入所經縣榆次、太谷、徐溝、太原、陽曲、壽陽、孟、平定、樂平及福建濱海晉江等縣各正官朝覲。⁹²

其中山西州縣凡19處。隆慶元年的蒙古掠晉事件是僅次於嘉靖二十一年的第二次大浩劫。

嚴峻的形勢迫使當道者必須尋求地方防禦之計。隆慶二年正月，山西督

⁸⁶ [明] 瞿九思，《萬曆武功虜》，卷7，〈中三邊一·俺答列傳中〉，頁72。

⁸⁷ 《明穆宗實錄》，卷17，隆慶二年二月癸未條，頁463。

⁸⁸ [清] 康基田，《晉乘蒐略》，卷30下，頁2404。

⁸⁹ 《明穆宗實錄》，卷17，隆慶二年二月乙巳條，頁487。

⁹⁰ 《明穆宗實錄》，卷17，隆慶二年二月癸未條，頁463。

⁹¹ 《明穆宗實錄》，卷12，隆慶元年九月乙亥條，頁342。

⁹² 《明穆宗實錄》，卷14，隆慶元年十一月壬子條，頁378。

撫官陳其學、楊巍上言邊防三事，其中的第一條為「嚴修守，調各郡縣城堡宜修築高厚，令居民編為保甲，且練且守」，隆慶皇帝「從之」，批准了該建議。⁹³今天的我們仍能真切感受到當時山西各地奉朝廷欽命急築城池，以保地方的緊張氣氛。史料記載稱：「隆慶丁卯秋九月，北虜犯晉，破石迫汾，甚急，尋亦寧謐。越明年戊辰春，當道者遵欽命，檄郡邑繕城壘，濬濠塹，修武備，以戒不虞」。⁹⁴「去歲丁卯，虜乘邊吏之不戒，闖入偏、老，蹂躪汾、嵐間，攻陷石州，殺擄極慘，遊騎且掠及霍州北境，于是河東大震，民四顧遑遑，莫適保聚。虜既去，監司乃下檄諸郡邑，築濬城池，督促旁午」。⁹⁵有史料記載說：「隆慶初，虜破石州，闔省修濬城隍」。⁹⁶顯示全省上下普遍出現了修築城池的熱潮。依明代之制，督撫之下仍舊由管內的分巡道或分守道進一步督令地方具體實施。冀寧分巡道沈人種就飭令州縣官修築了三座城池：「〔定襄城〕隆慶二年，巡道沈人種檄知縣李廷儒加修」、⁹⁷「〔靜樂城〕隆慶二年，巡按沈人種飭署縣事縣丞劉受興修城垣」、⁹⁸「〔交城城〕隆慶四年，冀甯道沈人種飭令所屬增築城垣，知縣韓廷用董其事」。⁹⁹知縣馬秉直則遵上峰之命興修了鄉寧城，「隆慶戊辰，因備虜患，知縣馬秉直承檄築北城」。¹⁰⁰隆慶二年十月，在山西督撫官在奏報中，詳細列舉修城表現突出者，並建議朝廷褒獎：

山西督撫官陳其學、楊巍等奏報，三晉士民各捐財力，修築城池堡寨六百餘座，省公費不貲。而蒲州、孝義、襄陵、洪洞、榆次、臨分（汾）

⁹³ 《明穆宗實錄》，卷 16，隆慶二年正月庚午條，頁 441-442。

⁹⁴ 〔明〕蕭繡，〈黎城縣修城記〉，收入〔清〕張淑渠、〔清〕姚學瑛等修，〔清〕姚學甲等纂，〔乾隆〕《潞安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卷 33，〈藝文續編五〉，頁 1a。

⁹⁵ 〔明〕張四維，〈條麓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4，〈平陽府襄陵縣新建磚城記〉，頁 666。

⁹⁶ 〔清〕楊駿修，〔清〕李中白、〔清〕周再勳纂，〔順治〕《潞安府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六年[1659]刻本），卷 6，〈建置·城池〉，頁 20b。

⁹⁷ 〔雍正〕《山西通志》，卷 8，〈城池·定襄縣〉，頁 269。

⁹⁸ 〔雍正〕《山西通志》，卷 8，〈城池·靜樂縣〉，頁 269。

⁹⁹ 〔雍正〕《山西通志》，卷 8，〈城池·交城縣〉，頁 247。

¹⁰⁰ 〔順治〕《鄉寧縣志》，卷 1，〈輿地志·城池〉，頁 6b。

等縣、東關、頭馬營堡城垣，工尤倍之。乞錄官吏效勞及士民助役者以次給賞。事下兵部復議，從之。¹⁰¹

實際上，不待隆慶二年朝廷詔令下達，尚在隆慶元年之時，如火如荼的築城運動就開始了，例如該年慘遭荼毒的石州城「以城廣人稀，難以據守，截去東南半壁而新築之」，¹⁰²城池規模大大萎縮了。綜合統計，隆慶元年凡有20次築城行為，二年為19次，三年和四年仍分別有11次和10次，此外，長治城之修築言在「隆慶初」¹⁰³，必定溢不出隆慶元年至四年的區間，故而隆慶元年至四年山西一省的築城次數達61次。隆慶五年（1571），明廷與俺答達成封王、通貢和互市協定，從此邊地寧謐，山西的築城行為迅速下降至僅5次。

隆慶元年至四年的61次築城活動共涉及57座城池。¹⁰⁴這一數量雖次於正統末景泰初，但比嘉靖中期卻多出17座。在空間分布方面，與嘉靖中期相比，明顯分散不少。具體來說，山西中部仍然保持了極高的築城率，僅有太原府城、孟縣城二處未見修築行為，「～」狀布局態勢得以保持。晉北地區的築城率比嘉靖中期大大提高，由當時的嵐縣、定襄、崞縣、靈丘4城增加至9城，這極可能與築城建議的提出者陳其學的身分有關，其時任宣大山西總督，管轄區域覆蓋山西全境，按規定晉北地區亦當補修城池。晉東南地區的築城數量與嘉靖中期相比，增加並不明顯，晉南地區的築城率卻有明顯提升，這極可能與嘉靖三十四年（1555）蒲州大地震的嚴重破壞有關。該年的大地震對晉南造成極大破壞，但事後很多城池並沒有立即修築，遲至隆慶二年闔省修城的詔令發布之後方得以補修，臨晉、猗氏、稷山、垣曲4城就是如此。以稷山修城為例，史料記載說：「嘉靖乙卯以地震盡頽，隆慶紀元秋，逆虜焱突，……廷議請西北諸內地悉高城濬池，為不可犯計，以寢其垂涎，詔允行。」¹⁰⁵知縣

¹⁰¹ 《明穆宗實錄》，卷25，隆慶二年十月癸未條，頁682。

¹⁰² 〔康熙〕《永寧州志》，卷2，〈城池〉，頁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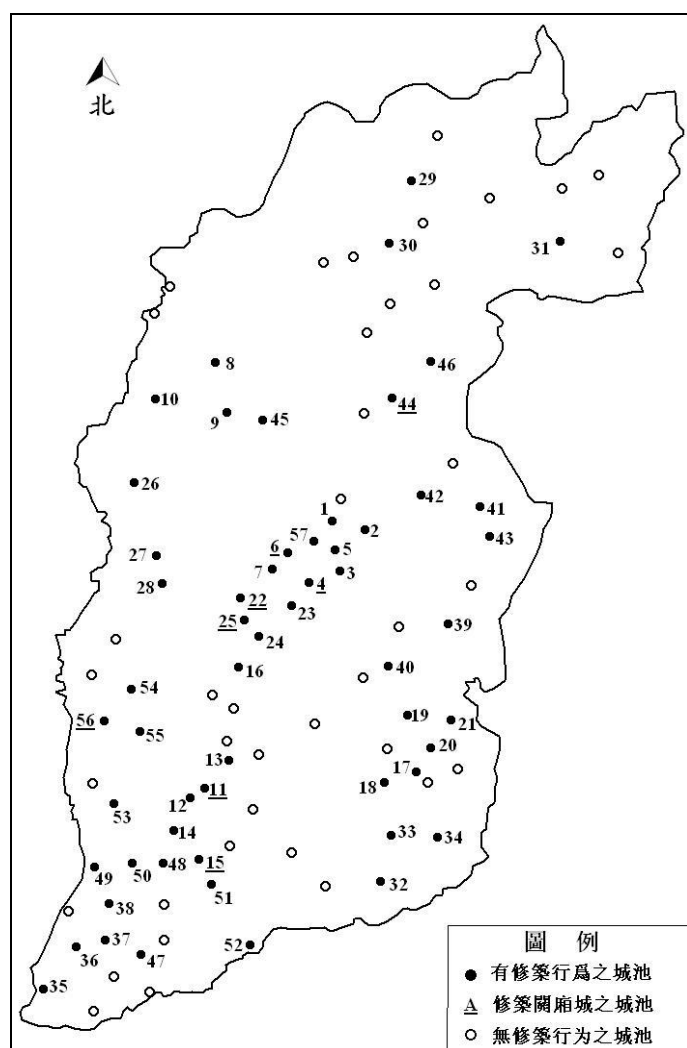
¹⁰³ 〔順治〕《潞安府志》，卷6，〈建置·城池〉，頁20b。

¹⁰⁴ 徐溝、寧鄉、臨晉、定襄4城在隆慶元年至四年期間各自有2次築城行為，故為57座。

¹⁰⁵ 〔明〕亢思謙，〈新築邑城記〉，收入〔清〕韋之瑗纂，〔乾隆〕《稷山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卷9，〈藝文中〉，頁16b。

孫信遂「奉檄修濬城池，經始於戊辰（隆慶二年）三月，迄九月告成」。¹⁰⁶（參見圖4）

圖4 隆慶元年至四年山西築城運動空間布局示意圖



說明：底圖採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明代·山西一〉，頁54-55。

注：1.太原縣城 2.榆次城 3.太谷城 4.祁縣城 5.徐溝城 6.交城城

7.文水城 8.岢嵐州城 9.嵐縣城 10.興縣城 11.臨汾城 12.襄陵城

¹⁰⁶ 〔乾隆〕《稷山縣志》，卷2，〈城池〉，頁1a。

- 13.洪洞城 14.太平城 15.曲沃城 16.靈石城 17.長治城 18.長子城
 19.襄垣城 20.潞城城 21.黎城城 22.汾州城 23.平遙城 24.介休城
 25.孝義城 26.臨縣城 27.石州城 28.寧鄉城 29.懷仁城 30.山陰城
 31.靈丘城 32.澤州城 33.高平城 34.陵川城 35.蒲州城 36.臨晉城
 37.猗氏城 38.萬泉城 39.遼州城 40.武鄉城 41.平定州城 42.壽陽城
 43.樂平城 44.定襄城 45.靜樂城 46.五臺城 47.安邑城 48.絳州城
 49.河津城 50.稷山城 51.絳縣城 52.垣曲城 53.鄉寧城 54.隰州城
 55.蒲縣城 56.大寧城 57.清源城

在隆慶前期波及全省的築城運動中，工程量同樣頗為可觀，太原盆地依舊令人關注，與此同時，其他地區的諸多城池同樣有著空前的工程量，諸如，晉西的石州城，晉南的臨汾城、洪洞城、晉東南的襄垣城、黎城城、遼州城、晉北的興縣城、定襄城等。很多城牆進一步加高增厚，敵臺、警鋪數量更為增加，先前很多土質垛口、城門、甚至城牆多易以磚石，屏蔽城門的甕城也多有修築，這些均是圍繞攻城之戰而採取的戰備措施，防範蒙古劫掠的目的不言自明。本次依舊有不少城池修築了關廂城，或為創築，或為增修，總計有祁縣西關城、汾州北關城等8處，大寧城修築了東西兩座關城，實際共為9座，這也是此波築城高峰中值得關注的現象。（詳見表四）

表四 隆慶元年至四年築城工程量一覽表

城池名稱	修築明細	資料來源
太原縣城	增城1丈	〔清〕龔新、〔清〕沈繼賢修，〔清〕高若岐等纂，〔雍正〕《重修太原縣志》（清雍正九年[1731]刻本），卷5，〈城垣〉，頁1b
榆次城	磚甃四面，增置敵樓16、警鋪12，三門之上各建大樓	〔乾隆〕《榆次縣志》，卷2，〈城池〉，頁2b
太谷城	益增高厚，南門加甕城	〔順治〕《太谷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頁5b
祁縣城	重修西關城：磚甃女牆	〔乾隆〕《祁縣志》，卷2，〈城池〉，頁20b
徐溝城	城牆增築高厚，加建東、西、南甕城	〔康熙〕《徐溝縣志》，卷1，〈建置·城池〉，頁9b

交城城	加修主城：周圍增厚，各樓廢壞者仍修飾之，北城牆抬高其基，城之四角各冠以樓，樓各12楹，女牆一道，石壘3尺，鑿池深廣各3丈，外列垣為蔽，補柳周匝；重修東關城：增高1丈，厚得高之強半，外為馳道，為隍，深廣各與高等，其堤列垣為蔽，植柳護之，四面鐵門內外甃以磚石，各冠以樓櫓，設為警鋪，陴口946	〔光緒〕《交城縣志》，卷3，〈建置門・城關〉，頁5a-b
文水城	繕修城郭，疏濬壕塹	〔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文水縣〉，頁247
岢嵐州城	重修城池	〔萬曆〕《太原府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卷5，〈城池・岢嵐州城〉，頁18
嵐縣城	磚砌女牆，建城門樓3座	〔雍正〕《重修嵐縣志》，卷2，〈城垣〉，頁1b
興縣城	砌以磚石，增敵樓12，角樓8，復增東南西三面城，高4丈，厚3丈，東南西三門築甕城，重建南城樓	〔乾隆〕《興縣志》，卷15，〈營築・城垣〉，頁2a
臨汾城	重修東關城：增高為3丈2尺，上廣1丈8尺，下基3丈，外包以磚，凡正門、小門樓臺俱增高廣，添角樓臺4座，增敵臺為17座	〔康熙〕《臨汾縣志》，卷1，〈地理志・城池〉，頁5a
襄陵城	城牆下部甃以石，上部包以磚	〔雍正〕《襄陵縣志》，卷5，〈城郭〉，頁1b
洪洞城	益增高厚，計高3丈5尺，上闊2丈3尺，磚墁二層，厚2丈5尺，周圍比舊寬250步奇，易土以磚，基礎以石，磚石厚7尺；六門上改建高樓，並角樓、窩鋪23座，池闊3丈，深半之，馬路闊2丈7尺，周圍以欄牆	〔萬曆〕《洪洞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頁12a-b
太平城	補修城垣，濬池深闊各4丈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太平縣〉，頁105
曲沃城	增築內外城，各加高1丈，共高3丈5尺，收頂1丈	〔康熙〕《曲沃縣志》，卷6，〈城池〉，頁2a

靈石城	增高6尺，幫築裏城7尺，上砌磚垛，內樹女牆，各門樓重加整飭	〔康熙〕《靈石縣志》，卷1，〈地理·城池〉，頁6a
長治城	修濬城隍，四周俱及泉，深4丈，闊如之	〔順治〕《潞安府志》，卷6，〈建置·城池〉，頁20b
長子城	重修城池	〔康熙〕《長子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地理志·城池〉，頁33
襄垣城	砌磚堞1500有奇，敵臺8座，修四門城樓，增東西南三門甕城，建重樓3座，角樓4座	〔清〕李廷芳修，〔清〕徐珏、〔清〕陳於廷纂，〔乾隆〕《重修襄垣縣志》（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卷2，〈建置·城池〉，頁1b-2a
潞城城	增高至3丈6尺（原高2丈6尺），置月城4座	〔清〕張士浩修，〔清〕申伯纂，〔康熙〕《潞城縣志》（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21b
黎城城	創築敵臺20，上各建樓，置角樓4，三門外創建重門，磚甃，增雉堞1500有奇，濬濠，深廣各1丈5尺	〔清〕程大夏修，〔清〕李禦等纂，〔康熙〕《黎城縣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卷1，〈地理志·城池〉，頁9b
汾州城	主城益增高厚，底厚4丈2尺，頂闊1丈8尺，高4丈6尺；創築北關城：周圍2里5分，高3丈2尺，基廣3丈，門4	〔順治〕《汾陽縣志》，卷1，〈土地志·疆域·城池〉，頁13b、14a
平遙城	增設敵臺94座，俱用磚砌，六門外創吊橋，立附城門	〔康熙〕《重修平遙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2a
介休城	加高1丈2尺，幫厚8尺，濬濠深闊，增敵臺110餘座，上各葺窩鋪，每間闊2丈有奇	〔康熙〕《介休縣志》，卷2，〈建置·城池〉，頁2b
孝義城	主城加高丈餘，悉甃以磚，炮臺、戍樓俱增於舊；大修南關城：補西面之缺，北面與橋北城相連，磚甃女牆，增敵臺14座	主城之修築據〔乾隆〕《孝義縣志》，卷1，〈城池·疆域〉，頁1b；南關城之修築據〔明〕梁明翰，〈修南郭城記〉，收入〔清〕方士謨纂修，〔雍正〕《孝義縣志》（清雍正四年[1726]刻本），卷16，〈藝文中〉，頁25a-b
臨縣城	石包東南北三面城牆	〔道光〕《臨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2a
石州城	城池截去東南半壁而新築之，高4丈8尺，長1020丈，基厚3丈	〔康熙〕《永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2，〈城

	2尺，頂厚1丈5尺，濬濠	池》，頁27
寧鄉城	東南北三面各增高5尺，幫厚8尺，北面濬重濠，廣2丈，深2丈5尺，築甕城，三門裏以鐵	〔康熙〕《寧鄉縣志》，卷2，〈地理・城池〉，頁4a-b
懷仁城	大牆增高4尺，磚甃女牆	〔清〕胡文燁等纂修，〔順治〕《雲中郡志》（清順治九年[1652]刻本），卷3，〈建置志・城池・懷仁縣城〉，頁3b
山陰城	城牆增高至4丈（原高3丈3尺）	〔明〕劉以守修，〔崇禎〕《山陰縣志》（明崇禎三年[1630]刻本），卷1，〈城池〉，頁6b
靈丘城	重修城垣，高2丈8尺，女牆5尺	〔康熙〕《靈丘縣志》，卷1，〈建置志・城池〉，頁27a
澤州城	增築敵臺23，創敵樓23，建北城樓1座，重修角樓4座，女牆砌磚	〔雍正〕《澤州府志》，卷16，〈營建志・城池・鳳臺縣〉，頁1b
高平城	重修角樓、敵臺，濬濠深廣各2丈	〔雍正〕《澤州府志》，卷16，〈營建志・城池・高平縣〉，頁2a
陵川城	增修城池	〔雍正〕《澤州府志》，卷16，〈營建志・城池・陵川縣〉，頁3a
蒲州城	磚甃全城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蒲州〉，頁107
臨晉城	易堞以磚，加濬城壕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臨晉縣〉，頁108
猗氏城	易堞以磚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猗氏縣〉，頁108
萬泉城	於北門建重城，重建四門城樓	〔清〕畢宿燾修，〔清〕張史筆纂，〔乾隆〕《萬泉縣志》（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卷2，〈城池〉，頁1a-b
遼州城	城牆加高7尺，加厚2尺，建敵臺25座，濠設內外重牆	〔清〕徐三俊修，〔清〕劉澐等纂，〔雍正〕《遼州志》（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卷2，〈城池〉，頁1b
武鄉城	城牆加高5尺	〔康熙〕《武鄉縣志》，卷1，〈城池〉，頁18b
平定州城	重修下城	〔乾隆〕《平定州志》，卷4，〈建

		置志·城池》，頁2b
壽陽城	增置甕城3所，角樓4，敵臺11	〔清〕龔導江纂修，〔乾隆〕《壽陽縣志》（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刻本），卷2，〈城池〉，頁1a
樂平城	修葺城池	〔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樂平縣〉，頁268
定襄城	郭外東西北三面築圍牆，基廣1丈5尺，高如其數；主城增厚至5丈5尺，高4丈3尺，池濬深至2丈1尺，闊2丈7尺，匝以翼垣，帽以磚埤，竅以敵洞，列以戍樓，煥以新門	〔明〕安嘉士修，〔明〕傅志說纂，〔明〕王立愛增修，〔萬曆〕《定襄縣志》（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卷2，〈建置志·城池〉，頁1b-2a；〔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定襄縣〉，頁269
靜樂城	增城高至3丈8尺，厚至5丈，甃女牆，修飾南城門，增置樓7，臺26，置鋪19，垛850	〔雍正〕《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8，〈城池·靜樂縣〉，頁269
五臺城	城牆之上建南、北二樓，外築郭垣	〔清〕周三進纂修，〔康熙〕《五臺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3，〈建置志·城垣〉，頁839
安邑城	築東西二月城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安邑縣〉，頁109
絳州城	加高城牆，池濬深1丈5尺，闊倍之，砌石堤長300餘丈以防汾河洪水	〔康熙〕《絳州志》，卷1，〈地理·城池〉，頁7a
河津城	增修城垣，深濬城濠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河津縣〉，頁109
稷山城	城厚至1丈8尺，高視厚增為丈者二，池深為丈者三，闊如之，辟門5，門上各有樓櫓，角樓4，敵臺25，雉堞1400有奇	〔乾隆〕《稷山縣志》，卷2，〈城池〉，頁1a-b
絳縣城	牆垣增高5尺，池亦濬深	〔順治〕《絳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建置·城池〉，頁521
垣曲城	垛口易以磚	〔康熙〕《平陽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7，〈城池·垣曲縣〉，頁111

鄉寧城	修築北城牆	〔順治〕《鄉寧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頁6b
隰州城	加高增厚，南門二門補建月城，東門外築墩臺4	〔清〕錢以塏纂修，〔康熙〕《隰州志》（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卷7，〈城池〉，頁1b-2a
蒲縣城	開南門，濬池深1丈，闊8尺	〔清〕胡必蕃修，〔清〕曹丕振等纂，〔康熙〕《蒲縣新志》（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卷1，〈方輿志・城池〉，頁6b
大寧城	重築北寨城，建樓櫓，創築東西關城，築南門外石堤	〔清〕杜瑾修，〔清〕劉源洙等纂，〔雍正〕《大寧縣志》（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卷2，〈建置集・城池〉，頁2b-3a
清源城	城垣增築至4丈（原高1丈8尺）	〔萬曆〕《山西通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4，〈武備上・城池〉，頁453

說明：表四「資料來源」一欄，除特別注明者外，藏所均為「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討論：三波築城高潮所折射的經濟與社會意義

上文對明代山西三波築城運動的考察實際上分別是基於共時性角度的復原，那麼，在歷時性層面，高潮迭起的築城行為能使我們得出哪些深層次認識呢？現在追溯起來，城市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基層社會的變遷是最值得留意的所在，而關廂城的修築和士紳群體的動向就是考察這兩大問題的極好視角。

（一）關廂城的修築看明代山西城市經濟的發展

西方研究中國城市史的學者提出了「中世紀城市革命」的概念，內容之一即為，北宋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在城牆之外發展了它的街區，也即關廂地帶有了明顯的擴展，成為城市建成區的重要組成部分。¹⁰⁷關廂地帶的經濟活力實為考察城市發展程度的參考。不過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

¹⁰⁷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24. 中譯：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4。

史料中關於關廂地帶的經濟發展態勢，往往記載較少，若有也僅是泛泛而談，描述較為模糊。相較之下，三波築城高潮中有不少關於關廂城的記載，這使我們把握明代山西城市經濟的發展態勢成為可能。此言何據？道理很簡單，地方官民之所以在關廂地帶修築城池，無疑是因為該地所擁有的大量人口以及富庶的經濟條件受到了外在的安全威脅。倘若在嚴峻的外部威脅面前，關廂地帶未見築城行為，可以大體說明該地的社會財富尚不足以通過修築城牆的方式加以維護。

正統末景泰初的首次築城高潮中，顯示有關廂城修築行為的城市凡有4座，即太原府南關城、大同府北關城、靜樂南郭城、代州西關城，均為創築。不過時至90年之後的嘉靖中期，情況有了很大變化。在這第二波的築城高潮中，關廂城的修築數量猛增至16座，即太原府南關城、榆次南關城、祁縣西關城、徐溝北關城、交城東關城、文水南關城、臨汾東關城、曲沃外城、汾州東關城與南關城、孝義南關城、臨縣外城、蒲州東關城、孟縣東關城、崞縣南關城、吉州外城，其中除太原、臨汾、臨縣、蒲州、吉州5座為重修之外，其他11座皆系創築。再降至隆慶初年，時間雖距嘉靖中期僅20餘年，但仍舊有9座關廂城得到修築，即祁縣西關城、交城東關城、臨汾東關城、曲沃外城、汾州北關城、孝義南關城、定襄外郭城、大寧東關城與西關城，其中汾州、定襄、大寧等處的4座關廂城為創築。顯然，正統末景泰初年雖在築城數量上佔有優勢，但其關廂城的修築卻大大遜色於嘉靖中期和隆慶前期，這正是明代後期山西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的體現。

關廂城地帶之富庶喧嘩在史料中多有記載。譬如，太原府南關城一帶的富庶就成為吸引隆慶元年蒙古入掠的重要動因：

穆皇初服丁卯，虜酋俺答益鴟張，復謀大舉。以太原殘傷，入無可掠，奸民趙全等教以「省城南關編戶數千，財貨畢集，且土城卑薄易破，可滿載而歸也」。於是率數萬之眾，決驢皮窯口，分道入寇。¹⁰⁸

從表三中可知，嘉靖中期第二波築城高峰時曾重修太原府南關城，城牆高2丈5尺，已經頗為可觀，但較之主城「三丈五尺」的高度明顯低薄，且城牆

¹⁰⁸ [明]陳長祚，〈三功祠記〉，[萬曆]《太原府志》，卷23，〈藝文〉，頁376。

系土質，故而使得隆慶元年蒙古軍隊有隙可乘。「景泰初建撫都御史朱鑒令居民築」¹⁰⁹南關城，無疑說明彼時的南關已經是富庶之地了。嘉靖二十一年創築的榆次南關城同樣是因該地人煙繁盛所致：「嘉靖辛丑，俺答至城下，大掠十日，關民七千餘家，半被焚戮，上司憫之，檄知縣李鵬創建土城三面，與大城聯絡，足資保障。」¹¹⁰徐溝北關一帶也是「民居輳集」，官方的「同戈驛遞衙門在焉」，於是方有嘉靖十九年創築北關城之舉。¹¹¹交城東關一帶「民居稠密」，故而嘉靖二十年知縣鄭鎬創築東關城，「延袤二里許」。¹¹²臨汾東關城創築於正德七年（1512），嘉靖中期、隆慶前期均大加修築，同樣是人煙麋集、商業繁盛之地，這從雍正版《臨汾縣志》的「東關廂圖」中即可明瞭，該圖標注了「木廠」、「豬市」、「羊市」、「春牛廠」、「油店」、「柴市」、「茶坊」、「鹽店」、「麻店」等明顯是專業市場的地名，明清平陽府的稅務管理機構——「稅課司」也位處東關，均充分反映出該地帶的經濟活力，此外，還存在陰陽學、義學、關帝廟、蔡倫廟、清涼寺等公共空間，這亦反映出該區域人口殷盛的事實。¹¹³該圖雖然繪製於清代，但考慮到地名往往具有高度的穩定性，故而明代東關已是平陽府城的經濟重心區之一應是沒有多大問題的，明代中後期東關城的創築、重修無疑是物阜人豐的體現。嘉靖十九年汾州東關城的創築也揭示出該區域的經濟實力，明代孔天胤（1505-1581）在《汾東關建城記》中說：

夫汾編氓十萬，城中居者，不及什一，而占東郭外者，殆十之三焉。
其勢三面當郡孔道，其民市殷富，然曠屏蔽，何以示守焉？故專為一城以保障之，宜莫先此矣。¹¹⁴

¹⁰⁹ [明]李侃修，[明]胡謐纂，[成化]《山西通志》（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3，〈城池·太原府城〉，頁95。

¹¹⁰ [乾隆]《榆次縣志》，卷2，〈城池〉，頁5a-b。

¹¹¹ [明]高汝行，〈徐溝縣新築北關城碑記〉，收入[康熙]《徐溝縣志》，卷4，〈藝文〉，頁15b-17a。

¹¹² [光緒]《交城縣志》，卷3，〈建置門·城關〉，頁5b。

¹¹³ [清]徐三俊修，[清]陳獻可纂，[雍正]《臨汾縣志》（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卷1，〈圖考·東關廂圖〉，頁7b-8a。

¹¹⁴ [明]孔天胤，〈汾東關建城記〉，[乾隆]《汾陽縣志》，卷12，〈藝文〉，頁19b。

東關人口已經大大超過主城，創築後的東關城周圍達9里，而主城亦不過是「九里十三步」¹¹⁵的規模，東關一帶的繁盛程度可見一斑。嘉靖二十一年孝義南關城的創築也在於「孝義居民西南城外尤為櫛密」。¹¹⁶嘉靖二十年重建的蒲州東關城在明代亦是民殷物阜之地：「關城所聚，貨別隊分，百賈駢轅，河東諸郡，此為其最。」¹¹⁷

現代城市地理學告訴我們，任何一座城市，在對外聯繫方向問題上，存在由多個方向組成的力場，不同方向力的強度通常是不均衡的，其最主要的力場所指向的方向即為城市的主要經濟聯繫方向，城市的實體地域會沿著其主要經濟聯繫方向延伸。¹¹⁸以上諸城的關廂地帶之所以經濟發達，實際上與其處於城市的主要經濟聯繫方向有關。從正統末景泰初到嘉靖、隆慶年間關廂城數量由少而多的史實中，我們清晰看到了山西城市經濟不斷發展的大趨勢。

（二）從築城中士紳群體的動向看明代山西的基層社會

歷時性地看待三波築城高潮所得出的認識不獨有城市經濟發展的一面，在社會層面上，它還折射出明代士紳群體的逐步壯大。

修築城池作為一項耗財、耗力、耗時的龐大公共工程，向來是地方官府的大事，基層民眾的參與程度無疑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若民眾對築城活動始終持以抗拒、逃避的態度，僅憑官方自上而下的嚴厲督催恐怕很難功成圓滿。然而，在正統末景泰初的首波築城高潮中，我們卻極難見到士紳群體的身影，至少筆者目前尚未接觸到明確記載士紳參與到築城活動中的文獻。譬如景泰初太原府創築南關城，史料載稱：「南關城，周圍五里七十二步，景泰初建撫都御史朱鑒令居民築。」¹¹⁹再如景泰元年創築太原縣城，史料記載：「縣治初改晉陽城南關，景泰元年知縣劉敏因舊基始築城，周圍七里，高三

¹¹⁵ [順治]《汾陽縣志》，卷1，〈土地志·疆域·城池〉，頁13b。

¹¹⁶ [乾隆]《孝義縣志》，卷1，〈城池疆域·城池圖說下〉，頁5a。

¹¹⁷ [乾隆]《蒲州府志》，卷4，〈城池〉，頁4a。

¹¹⁸ 周一星，〈主要經濟聯繫方向論〉，《城市規劃》，1998：2，頁22-25。

¹¹⁹ [成化]《山西通志》，卷3，〈城池·太原府城〉，頁95。

丈，壕深一丈，門四，東曰觀瀾，西曰望翠，南曰進賢，北曰奉宣」¹²⁰，均未見及士紳的參與。事例無需再舉，明代前期士紳群體作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尚未形成已然是難以否定的事實。

不過，降至嘉靖、隆慶年間，局面就完全變了。明代中後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科舉制度的推動，士紳、富民群體逐步發展壯大，在後兩次的築城高潮中，士紳、富民的動向遂頻頻見諸記載。他們在築城這一地方「公共領域」中極為活躍，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考量，他們常常慷慨解囊，分攤巨額的築城經費，有時甚至發起群體性的「陳情」運動，借此給地方官府以必須築城的壓力。士紳、富民群體往往能夠支配社會輿論，其一言一行對於地方官府的影響是巨大的。地方官員也往往將士紳作為施政所倚賴的對象，築城活動中遂常見官紳相謀的場景。嘉靖中期、隆慶前期的諸多築城實例一次次地印證了筆者的上述判斷。

譬如，嘉靖二十一年太原縣城的修築：「嘉靖二十一年，因北虜入境，縣人王朝立、高汝行等復率邑人勸分財力，更加補葺，又外增敵臺三十二座。」¹²¹王朝立乃是明代重臣王瓊（1459-1532）之子，「王朝立，少師恭襄公長子，以恩蔭授右軍都督府都事」，¹²²士紳身分確定無疑；高汝行則有著進士頭銜，曾任廣平府知府，「以誣回籍，屢薦未起」，¹²³鄉居士紳身分亦無疑問。嘉靖十九年平遙縣城的修築中也有士紳的身影：「嘉靖十三年因河冲城角，十九年，舉人雷潔、監生任良翰督率築完，得免寇患。」¹²⁴嘉靖二十年平定州修城的決定，則是冀寧分守道王儀與士紳白東泉等人相謀後作出的：「嘉靖辛丑寇入雁門，及會城，旁掠屬邑，遂至平定，……寇甫退，分守大參文安肅庵王公行部至郡，……復謀於郡之士夫白東泉諸公，咸以為茲民命惟公是賴。」¹²⁵從嘉靖十九年徐溝北關城的修築中，我們看到的是向官府「陳情」築城的士紳

¹²⁰ [嘉靖]《太原縣志》，卷1，〈城池〉，頁5a。

¹²¹ [嘉靖]《太原縣志》，卷1，〈城池〉，頁5a。

¹²² [嘉靖]《太原縣志》，卷2，〈恩蔭·王朝立〉，頁27a。

¹²³ [嘉靖]《太原縣志》，卷2，〈科第·高汝行〉，頁14b。

¹²⁴ [康熙]《重修平遙縣志》，卷2，〈建置志·城池〉，頁1b。

¹²⁵ [明]李念，〈重修平定州城記〉，[乾隆]《平定州志》，卷9，〈藝文志〉，頁32b-33a。

形象：「（嘉靖十九年）九月，右方伯章公按行至縣，北關耆民陳被害之狀，具可成之圖，章公遂命署縣經歷宗文喜董其役。」¹²⁶同樣的例子還有嘉靖二十一年孟縣東關城的修築：「明世宗二十一年紳民張淑名等呈縣合力修築（東關城）。」¹²⁷

相較之下，在隆慶元年洪洞縣城大修中，士紳群體發揮的作用就更有典型意義，明人高文薦對此有詳細論述：

隆慶丁卯，虜寇岢嵐路，入陷石州，遠邇震怖，說者謂石城不險，於是洪洞諸大夫謀增土垣。行太僕卿韓君廷偉、參政劉君應時、參議王君三接、戶部員外郎今封都御史前舉人晉君朝臣、巡撫寧夏都御史前太常少卿晉君應槐（即朝臣子）、知縣韓君廷芳、敕封御史前縣丞于君邦聘，咸集議焉。朝臣獨奮然曰：土增新舊不相能，淫雨必潰，且虜狡而易攻，蓋磚之為長固計。邑人淺謀者以慮始為難，吝財者以廣費為惜，群議沸然。至有榜匿名於通衢，欲集惡少數百人為禍於諸大夫，眾愕然。獨朝臣曰：此非吾身家事，邑人千百年利也。持議益堅。應時贊之亦力。應槐曰：此詐也，叢爾之邑，一日之間安得有數百之約？盍焚之，且鄉人非可與口舌爭也，宜請於郡長。檄下，議遂定。有司白於朝，可其奏。會邑缺長吏，人情洶洶無所倚。朝臣遂身任其事，晝夜殫畫，鳩工役、理物料。尋與諸大夫議舉里中才行壓眾者八十人，某也董磚、某也董灰、董土、董木石，工役各因才屬之。是時官帑空虛，患無財，議公舉所知，自百金至三五錢，量貲為差；患無力，議乏財者依丁出役；患無石，議各塋移石桌、場圃運碌礪、間架納頑石；患工匠無食，議照則輸食；患財無守，議舉行誼老成人於武安王祠收納，請縣之十吏記籍，互相譏防，以原封給磚灰值及丁壯資。諸大夫廷偉、三接慨然曰：吾當總土務，應時曰：吾當總灰務，應槐曰：吾當總磚務，廷芳曰：吾當總工役務。……於是增土砌垣，周五里二百五十步奇，原高一丈六尺，今增一丈一尺，共二丈七尺，女牆六尺，

¹²⁶ [明]高汝行，〈徐溝縣新築北關城碑記〉，〔康熙〕《徐溝縣志》，卷4，〈藝文〉，頁16a-b。

¹²⁷ [乾隆]《孟縣志》，卷4，〈建置志·城池〉，頁2b。

共高三丈三尺，原厚八尺，今增一丈二尺，共厚二丈，磚基入垣七尺，石疊五尺，有長石為釘，頂有重磚為墁，女牆、鋪舍煥然軒翔，拓馬路，廣二丈七尺，濬壕塹，深一丈五尺，廣三丈七尺，壕邊植以茂樹。工始於戊辰春，訖冬十月，百雉具起，謗者愧伏。時尚樓角未建，邑令王君詔來，焦勞率作，建樓櫓六，角樓四，勳勞琅琅。¹²⁸

引文中所提及的晉氏、韓氏、劉氏均是洪洞縣的名門望族，多在嘉靖年間借助科舉的成功，實現了宗族崛起，從而成為洪洞地方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力量。晉朝臣乃是嘉靖十九年舉人，官至戶部員外郎，萬曆年間在知縣喬因羽的主持下纂修了著名的《洪洞縣志》，是洪洞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朝臣之子應槐是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至寧夏巡撫，是晉氏宗族中官位最高者；韓廷偉、廷芳兄弟分別為嘉靖五年和嘉靖二十年進士，同樣踏上仕宦之途；劉應時為嘉靖三十四年舉人，官至四川馬湖府知府。此外，晉氏、韓氏、劉氏三家還世代互相聯姻，實際上形成了勢力異常龐大的洪洞士紳共同體。¹²⁹隆慶元年洪洞修築磚城的絕大部分工程量實際是在知縣「不在場」的情勢下單獨由士紳率領完成的。從築城動議的提出，到直面反對修城者的人身威脅，再到動議確定後「陳情」於官府，又到具體謀劃籌措，乃至納金輸力，我們從一個個鮮活生動的士紳形象中看到是士紳群體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在築城運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以上所述城池修築時有關士紳動向的多個案例，可清晰體現出明代後期山西士紳群體日益壯大的事實，這正是一股維持傳統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中堅力量」。

本文於 2012 年 12 月 23 日收稿；2013 年 11 月 07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郭偉鴻

¹²⁸ [明]高文薦，〈重修邑城記〉，[萬曆]《洪洞縣志》，卷 1，〈輿地志·城池〉，頁 14b-15b。

¹²⁹ 常建華對洪洞晉氏、韓氏、劉氏三大族宗族組織的形成問題有深入討論，從中可進一步瞭解洪洞三大士紳群體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演變過程。參見常建華，《宋以後宗族的形成及地域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175-244。

Northern Frontier in Alarm: Mongol Invasion and City Wall Construction in Ming Shanxi

Li, Ga

Associate Professor ,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 Shanxi
University

City walls were 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totally 646 times in Ming Shanxi. The most active three periods were the turn of Zhengtong (正統) and Jingtai (景泰), the mid-Jiajing (嘉靖), and the early Longqing (隆慶). It was primarily a response to the Mongol invasion in Ming Shanxi frontier.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Ming period, suburban settlement and its people flourished as a result of urban economy growth in Shanxi.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se, the number of the guanxiang city walls (關廂城) were increased to protect those suburban settlements. Workers were organized by local government. Bu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wall, the role which gentry as a local elite group played wa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Keywords: city wall construction, war, Ming-Mongol relations, Ming Dynasty, Shanxi